



2010 年 11 月 30 日 21 期

总第六十三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阎长贵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感想](#)

[启 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的误译、误植及其它——与著、译、校者商榷](#)

史林一叶

[王 锐 “北大才子”沈元被处决及其它](#)

简讯

[高 原 《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出版](#)

[魏曙明 《亲历“文革”——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即将出版](#)

闲读偶记

[徐海亮 写在《亲历“文革”——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即将出版之际](#)

忆旧思亲

[吴允弘 忆父亲吴天石](#)

文摘

[黄 正 将军最后的一声吼](#)

[刘海鸥 大串联中新疆行](#)

小资料

[董国强整理 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编读往来

【国史笔谈】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感想](#)

[阎长贵](#)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感觉文字通畅、流利、新鲜、亲切，觉得不像外国人写的书，这实在要感谢作者和译者、校者的中文功底。

这本书从内容讲，客观、全面、系统地用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性、疯狂性、残暴性和残酷性。迄今为止，它是我读到的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文革史。这本书是外国朋友写的，面对这本书，一方面我们十分感谢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先生，这是他们几十年的心血结晶；一方面感到汗颜，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样一部文革史？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该书对文革史研究有什么贡献，或者说，和其他文革史著作相比它有些什么特点？我谈一些想法和看法。

该书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最高领袖要决心摧毁自己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左岸文化版 22 页，下同）这抓住了研究文革的关键和中心。这也是中外许多文革研究者都在思索和面对的问题。有的中国研究者也提出：“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类似说法很多。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搞明白了，文革的其他问题就容易想清楚，搞明白。可以说，这是研究文革整个过程和问题的一个纲。“纲举目张”，研究文革应该紧紧抓住这个“纲”。

人们，包括当时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不知道、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做？而毛泽东确实是这样想、这样做的。还在文化大革命未正式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向中央进攻”，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他在《七律·有所思》中倡言“青松怒向苍天发”，接着在1966年8月第二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全会上（第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

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郑重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等等，无数事实表明：“矛头向上”——从党的基层领导到各级党委直到中央是文革区别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一个显著特点。文革中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概源于此。不少人说“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林彪提出的主张，这是没道理的。毛泽东把亲自参加缔造的新中国视为“旧世界”，要摧毁。红卫兵提出“砸烂旧世界”，并广泛传播，变成整个文革的指导思想，这确实是执行和实践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译校者唐少杰先生说《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具体地凸现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特殊作用这一条主线”（7 页），这确实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该书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决议》大胆地宣称文革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又指出：“《决议》试图免除毛对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的责任”（457 页）。对《决议》的这个评价是很中肯、很精辟的。我们国内关于文革的书（包括一些民间的）基本上都是按照《决议》的精神写的。把文革中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林彪、“四人帮”所为。这是处理和解决文革中一切问题的一个公式。该书不受这个限制，完全从事实出发，“是是非非”——“寓褒贬，别善恶”（《三字经》语），明确地指明了毛泽东对文革中所有重大战略部署和活动所起的作用及应所负的责任。

让我们看看该书的一些说法：

——关于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我们国内有人说没经过毛泽东“批准”，相当权威的书上直接引毛的话说这件事开始他“不知道”。应该说，这是经不起史实证明的。毛泽东明明说过是他“建议”江青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明确指明了这点。它说：“1965 年 2 月 24 日，毛泽东派遣自己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点燃文革的火种”，即“让她着手对吴晗发动反击”（33、34 页）。又说：“主席批准和参与了上海的秘密行动，其矛头直指北京的党组织，特别是彭真。”（36 页）还说：毛“发动文革的方式是让江青秘密地组织撰写报刊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抨击一位知识分子，从而打

击北京市委的头号领导人。”（69 页）

——“刘少奇的困惑和邓小平的否定都说明了文革是毛及其心腹在私下策划的，他们瞒过了在主席离开首都期间在名义上管理国家的那些人。”（80 页）

——“文革的幸存者把运动最可恶的行为归罪于毛激进的同伙……但主席有意为之的含混晦涩才是最终的原因”（66 页）。

该书视野广阔。正如译校者唐少杰先生所说：“此书的真切主要在于其写作的笔触不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而且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用他们鲜活的话语或真实的记述来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7 页）该书很多地方都显现了这个特点。比如，对文革初期改组北京市委问题，一位中学生在 6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谁也不知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79-80 页）该书指出，在清洗彭真以及市政府的直接影响下，很多北京市中小学的校长已经停止了日常教学活动，即使幼儿园的老师也开始卷入了文革。人们很不能理解小学的停课。对于一个 7 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来说，参与阶级斗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呢？一位北京小学的校长抱怨道：“阶级斗争这，阶级斗争那；鸡毛蒜皮的事都成了阶级斗争！”

（76 页）对“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一位上海老技师在 1966 年 8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情况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还在发展，如抄家，先是资本家地主然后发展到干部家及在运动中的重点对象。……为了破四旧而去，但有人浑水摸鱼，乘机打击，谨防扒手，有坏的，乘机动手脚侮辱妇女。还有人在马路上脱裤子，脱衣裳，剪头发，全部书刊全部交出来，滚蛋。（132-133 页）书中还专门有一节叫做《基层民众的生活》（377-381 页）

总之，“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该书不仅有中国普通人文革的经历和对文革的反映，还多处多次提到外国人对文革的反映。曾在非洲任过职的瑞典大使 1966 年 6 月 16 日致信瑞典外交大臣：北京从五月以来进入了疯狂的状态，六月三日以来日以继夜地举行游行，支持毛泽东和北京新市委。一群群游行队伍步行或者乘卡车经过我们的房子，单调、刺耳的锣鼓声扰得我们直到清晨才能入睡。和这些噪音相比，非洲人的手鼓倒成了我记忆中的天

籓。(77 页)一位生活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籍对文革初期上海市长曹获秋评论说：“曹市长的话听起来似乎不错。和以往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密谋反对学生和毛的亲信的坏人，而是一个真诚的行政官员，他担心文革会冲击上海的工业，真心想让中央看到这一点。”(127 页)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该书填补了一些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有“五一六阴谋”专章，还有“陶铸一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专节，这都是相当新鲜的。有的文革书也涉及到了抓“五一六”和陶铸问题，但都不够详细和具体，特别是回避了主要责任人问题。陶铸是文革初期打倒的最高的领导人之一(所谓“四号人物”)，毛泽东说这件事是陈伯达和江青两个人干的。说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当时陈伯达是“五号人物”(在常委中排名第五)，一个“五号人物”能打倒“四号人物”吗？再说江青，她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能决定打倒政治局常委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比较具体地论述这个问题。它说：“主席在陶铸倒台过程中的作用始终晦暗不明”；同时它又说：“如果毛告诉他们不要攻击周恩来，他们会言听计从。他们极不可能在主席根本没有默许的情况下，还去花两个月的时间来攻击陶铸。如果毛想在十二月底保护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或者，为什么不在私下里告诉他们，他不容许再对陶铸进行攻击呢？……”其结论是：“毛完全知道倒陶的行动”(197-201 页)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文革史书关于陶铸倒台最接近和符合历史事实的叙述和说明。应该指出，到现在为止，关于打倒陶铸的责任和过程还只有《王力反思录》说得比较符合实际，该书明确地指出要打倒陶铸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和《王力反思录》互相辉映。

关于抓“五一六”的问题，这是波及全国、伤害达上千万人的大错案和冤案，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有的文革书(如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谈到了，但很多文革书，包括相当权威的书都没涉及。我们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不仅有专章“五一六阴谋”——这一章有抓“五一六”过程的一般叙述，还有“王乃英案”个案的描写(王乃英是林杰的妻子)，这充分说明作者的客观严肃精神和收集材料之广、之细、之深的认真态度。

关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节，这几乎是中外文革史书独有的。它使人们

对文革的认识和了解更全面更完整，特别是人们认识 and 了解文革的残暴性和残酷性，“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节有独特的作用。该书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于 1966 年，但是前者多不公开。……中央文革小组至少在名义上是管‘文化’的，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完全从事暴力。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之首，那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就是文革之尾，前者挑起动乱，制造专案，后者则最后定案。”（288-289 页）这个分析是很精辟，已被其它的文革著作所引用。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有很多很宝贵的文革原始资料和精彩观点，再举一例。该书有一节《“九评”之九》，即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所谓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文章的评论；认为这篇文章“包含了发动文革的理由”（26 页）。这个见解是很独到很新颖的，我在其他地方似乎还没见过。该书引录了这篇文章的下面这段话（这段话是毛泽东的）：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作者评论道：“这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破产的暗淡前景，这也正是发动文革的理由。”（31 页）我们看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其中毛泽东加的一段画龙点睛也可称为《通知》灵魂的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

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历史证明，——尽管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明确指向文化大革命主要目标刘少奇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国只有刘少奇称得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在批判刘少奇时他也确实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大家看，《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九评’之九”的精神何其契合一致。《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说“‘九评’之九”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包含发动文革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非常深刻的。该书把“九评”特别是“九评”之九和发动文革联系起来，就把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联系起来了，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顺便说一下，有篇采访王光美的访问记，篇名叫做《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其中有个问题：“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参见《百年潮》2009年第11期)显然，这告诉人民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歪曲历史真相，自欺欺人！

上面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说了一些肯定和赞扬的话。并不是说，这本书十全十美，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我整理了一份小资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一些具体史实问题》，准备转给作者参考，这里就不说了。我只谈一点，就是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该书充分肯定了华国锋的首要和主要作用。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让中央办公厅的有关人员电告各省委，要求他们以后遇到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时，不要再找以前一直联系的人，而是直接同王洪文领导下的新的值班室联系。该书说：“这件事迫使华决定立即着手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九月十一日，华走访了李先念，要他立即与叶剑英接触……”；在谈到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的问题时，该书说：这件事“……严格保密，没有必要知道的人都排除在外，甚至李先念也不知道行动细节”(444、445页)对李先念这个论断我在其他书和文章中仿佛还没看到过。而这完全是符

合事实的，我听汪东兴不止一次说过这个问题。

该书又说，华、叶、汪两次一起讨论十月六日的行动计划，这不准确。我听汪东兴说，关于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的计划，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分别单线联系。该书说粉碎“四人帮”后华“拖延”让邓小平复出以及华的其他一些表现，联系华国锋逝世后披露的一些事实看，也不尽符合实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该书成书于华国锋逝世前。我想该书再版时会根据后来披露事实作出适当修改的。

本书两位作者在书的最后，运用毛泽东“坏事可以变好事”的观点，庄重指出：“文革虽然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但是从其之中孕育出一个更加明智、更加繁荣，也许有一天还是民主的中国。到那时，中国人也许会公开面对在文革中彼此犯下的恶行，并对导致这一切的主席的责任做出最后的结论。”（462页）这个分析、预见是科学的，应该说这已经和正在逐渐（也一定要全部）变作现实，两位历史学家的睿智实在令人敬佩。两位作者这个结语和论断非常重要，它启发和教育我们一定要厘清文革的来龙去脉，认真总结和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文革的悲剧不能重演，历史的缺欠要用历史进步补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文革研究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沈迈克和麦克法夸尔先生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受到普遍欢迎的文革史著作？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既有热爱中国的心，又有历史学家的严肃客观的精神。麦克法夸尔先生说，他从1968年起，即文革开始不久，就开始研究文革了，完全可以说他是研究文革的前辈先驱（或之一），其后又长期担任在美国被称为“核心课程”的中国文革史的教学工作。他这部文革史确实确实是几十年心血结晶。其合作者沈迈克先生在文革中不仅有中国留学的经历，对文革有很多切身的感受，他有很好的汉语水平和卓越的语言口才（听他说汉语，不看其面听不出他是外国人），接触和结交了中国很多文革亲历者，又是一个有心人，千方百计收集文革史料，跑潘家园和各个旧书摊——“功夫不负苦心人”，他找到了非常重要的鲜为人知的关于文革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很多文革研究者也自愧弗如，我就是这样的，潘家园我一次也没去过。沈迈克的夫人是我们中国同胞，所以他经常来中国，直到今天，他每来中国一次还都还要跑潘家园和各旧书摊，这种孜孜以求永不疲倦的精神何

等可贵！

沈迈克先生和麦克法夸尔先生的合作是“珠联璧合”，他们同心协力写作了这部中国文革史，这是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我们中国人应特别感谢他们。我们中国的文革研究者要认真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也同心协力地排除千难万险地尽量把文革研究往前推进一步。最后，再次向沈迈克和麦克法夸尔两位先生感谢、致敬！

2010年6月于北京

【国史笔谈】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的误译、误植及其它

——与著、译、校者商榷

启 之

在我读过的译著中，此书的译文堪称一流。我说的一流，指的是译者高超精妙的中文——没有深厚的母语修养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为此，我曾经邀请译者关心先生出席此书的研讨会。令我惊讶且遗憾的是，此书的出版策划人汪宇先生告诉我，关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集体的笔名。

当我在构思此书的书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修辞——我想以此书为例，谈一谈大陆国史在修辞上的沉疴重疾。也就是说，我没想就此书的翻译说三道四。但是，跟作者一样，我也是一个患上了强迫症的完美主义者——如果面对白璧上的微瑕而沉默不语，或仅仅为那块璧玉歌功颂德，那不但对这本传世之作不负责任，对我本人的身心健康也是一个损害。出于这种自私自利的目的，我不能不把我发现的问题——指出。当然，这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对于著、译、校者来说，它们属于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对于我来说，则是愚者千虑，偶有一得。

我将这“偶然间的一得”分为误译和误植两部分，二者的区别在于，误译侧重于英文理解，误植偏重于中文表达。另外，为了追求完美，我还

要将原著中的问题列在拙文的最后。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所列中文页码出自台湾左岸版，英文页码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误 译

误译一：

- 中 125：八月十九日，在上海模仿北京举行的大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人借着瓢泼大雨和满天黑云，让替身扮演毛泽东向走过的人群挥手致意，这种事情是毛及其同事做不来的。
- 英 108：While their colleagues holding a copycat rally in Shanghai on August 19 took advantage of heavy rainfall and darkness to let body doubles wave at the passing crowds part of the time, this was not something that Mao and his colleagues could do.

说明：这里的关键词是 body doubles，将其译成“让替身扮演毛泽东”不知道所据为何。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逻辑上，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胆大妄为的事。这里的替身，扮演的是上海市委领导人，而不是毛。

误译二：

- 中 281-282：就像三年前对待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样，为了捍卫他作为解放军首脑的地位，林彪诬蔑刘少奇参与二月逆流，打击这位同他名声旗鼓相当的元帅。
- 英 275：As in the case of Chief of Staff Luo Ruiqing three years earlier, Lin was protecting his position at the head of the PLA, on this occasion by stigmatizing his peers among the marshal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February Countercurrent.

说明：“林彪诬蔑刘少奇参与二月逆流”显然是误译。在英文里，根本没提刘少奇。这句话应译为：……为了捍卫他作为解放军首脑的地位，林彪诬蔑元帅中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同僚们参与了二月逆流。

误译三：

- 中 366：修改后的党章除了删除有关林彪的内容以外，还加入许多起草文件，

这是激进派所关心的内容。

- 英 362: The revised party constitution went beyond excising Lin Biao, inserting a number of passages reflecting the concerns of the radicals who had drawn it up.

说明：上述翻译有两处错误，一、党章中加入许多文件，这话不通。党章是一文件，这个文件当中怎么加入其它文件，而且加许多呢？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译者将 passages（段落）当成了 documents（文件）二、英文说得很清楚，这些段落来自于激进派。而中译里对此没有说明。兹试译为：“修改后的党章除了删除有关林彪的内容以外，还加入大量的段落，这些段落是激进派起草的，也是他们所关心的。”

误译四：

- 中 409: 邓非常有自制力，他断然拒绝被帮助。
- 英 408: Deng was very much in control, and bluntly refused to be “helped.”

说明：按通常的理解：在那种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中，邓小平如果有自制力，就不应该拒绝毛远新的帮助。而应该控制自己，不要跟毛远新闹翻。而他却“断然拒绝被帮助”，这实际上是没有自制力。从表面上看，“in control”这个短语确实是有控制力的意思，但是在这里。作者似乎用它表达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邓完全控制了当时（他与毛远新）的谈话。所以后面才有邓“断然拒绝被帮助，毛远新讲完后发现邓小平不准备作检讨，而是坚持斗志昂扬地为自己过去的几个月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内容。

误译五：

- 中 442: 上海的一位外国教师在日记中……又写道：“这里的人确实要哭得少，也不大公开宣扬。这也说明那些翻来覆去的仪式，不断加码的哭声（当然，不是公开要求的）。”
- 英 441: In Shanghai, a foreign teacher noted in her diaryShe added: “And, in fact, here people do weep less and make fewer scenes. Which accounts for the repetition and the beefing up of ceremonies, and the invitations-----not public, needless to say---to cry harder.”

说明：这一段有两个问题。一是 make fewer scenes 这个短语的翻译。二是

这个句子不完整。先说 *make fewer scenes*，译者将 *make fewer scenes* 的意思混同于 *make the scene*，（露面，参与）于是就译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也不大公开宣扬”这样的中文。事实上，*make fewer scenes* 这个短语应该来自于 *make a scene*（现场一片混乱），它是 *make a scene* 的比较级。其意为“现场不那么混乱”“人们的（悲痛）表现不那么强烈”。再说译文的不完整：“这里的人确实要哭得少，也不大公开宣扬。这也说明那些翻来覆去的仪式，不断加码的哭声（当然，不是公开要求的）。”显而易见，这句话没有完。此句似可译为：“这里的人确实要哭得少，（哀悼）的场面也比较冷清。由此可以解释，为了诱使（*invitation*）人们哭得更厉害一些，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并加强那些哀悼场面。”

误译六：

- 中 447：在华国锋宣读了鉴于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其实施逮捕的决定，据说，王在被带走时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
- 英 447：After Hua Guofeng had read out the decision to have him arrested for “crimes against the party and against socialism,” Wang is said to have muttered to himself,

说明：此句不通顺。译者拘泥于英文中的 *After*（在……之后），却又没有将这个短语完整地译成中文，而其后的文字也缺乏适当的调整。试将上面的译文与这样的句子做一比较——在华国锋宣读了鉴于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其实施逮捕的决定之后，王被带走。据说，他还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哪一个更通顺畅达？

误译七：

- 中 464--465，人物简介“陈再道”条：……卷入了一九六七年夏天的武汉事件，当时支持老师们的群众组织以及他麾下的官兵绑架了中央特使，他被囚禁。
- 英 466--467,when members of a conservative mass organization together with officers and men under his command kidnapped an emissary from the center.

说明：中译中的“老师们”来自从英文 *conservative*（保守的）。这句话应译为：支持保守的群众组织。“绑架了中央特使，他被囚禁。”也易被读者误解为

在绑架中央特使的同时将他囚禁。

误译八：

- 中 469，人物简介“牛皖平”条：老师们红卫兵组织“联动”的创立者之一。
- 英 472， and co-founder of the "conservative" Red Guard United Action Committee.

说明：中文不通。误译的原因与上同。“老师们”来自英文 conservative（保守的）。这句话应译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联动”的创立者之一。

误译九：

- 中 471，人物简介“王力”条：在武汉事件中被老师们劫持。
- 英 473， Was kidnapped by conservative during the Wuhan Incident.

说明：中文不通。误译的原因与上同。“老师们”来自英文 conservative（保守的）。这句话应译为：在武汉事件中被保守派劫持。

之所以会如此频繁地将“保守的”/“保守派”译成毫不相干的“老师们”，可能是因为译者误解了“老师们”的校注。此书第十一章的标题是“老师们的最后抗争”，其校注云：作者在这里使用的以及全书反复出现的“The Old Guard”一词，原意是指某一事业（或主张）的老一辈的维护者，尤指政党内当权的保守派……。缺乏文革常识的译者，在心中划出了这样的一等式：“The Old Guard”= 保守派= 老师们。所以，当他/他们看到 conservative 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将它译成了“老师们”。

误译十：

- 将第 23 章英注 49 的后一部分（《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第 20 期，1987 年 8 月，页 28。）误为注 50。这样一来，就把英文版中的注 50 变成了注 51。于是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注 51 以后的 16 个注释与书中的编号都发生了错位：中文正文中标的注 54，在书后的注释中变成了 55。正文中的注 55，在书后的注释中变成了 56。其余以此类推。二，上述错误，使中文版中的这一章的注释多了一个。英文版中有 67 个注释，到了中文里成了 68 个。

误植

误植一：

- 中 22，第二份就是闻名昭著的“秘密报告”……
- 英 4，and the second, his notorious secret speech……

说明：notorious 意为臭名昭著的，声名狼藉的。其实，即使仅看中文，也足以发觉这句话的问题：闻名一般用于褒义，“昭著”总是用于贬义，将“闻名”与“昭著”生捏在一起，不但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而且改变了这句英文原有的贬义。

误植二：

- 中 117：因而，这就是毛泽东用来创造美丽新世界的脆弱组织。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阴谋诡计组成了新的领导阵容——未来还会进行多次的清洗后，毛现在该着手进行他的文革……

说明：这段中文在反复仔细阅读后，可以理解。由此说明，它的表述不能让人一目了然。问题出在破折号后面的那个“未来还会进行多次的清洗后”。如果不拘泥于那个破折号，而将这个定语加以修改放在前面：……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阴谋诡计组成了新的、还会进行多次清洗的领导阵容之后，毛现在该着手进行他的文革……。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

误植三：

- 中 136：遣返或屈辱（第七章的第二个小标题）。

说明：尽管连接两个英文名词 Repatriation /Humiliation 的是 or，但是，此处还是应该把这个短语译成“遣返与屈辱”。“或”是两者取一，要么是此要么是彼。“与”（和）是两者兼有。而这正是这一节的内容。

误植四：

- 中 219，这样以来，毛所认可的矛盾则暴露无遗。

说明：不用看英文也知道，“这样以来”是个笔误。应该是“这样一来”。

误植五：

- 中 248，公开上演一出叫做《南疆烈火》的“黑戏”（编注：不健康的戏剧），以及当地艺文界对取缔“黑会”（秘密集会）、“黑戏”的反感。
- 英文 237，sinister play, sinister meeting.

说明：sinister 是形容词，意为阴险、凶恶的、邪恶的。把上述词组译为“黑戏”、“黑会”是对的，但是编注的解释不准确。黑戏不是“不健康的戏”，黑会

也不宜解释为“秘密集会”。在文革的语境里，黑戏指的是“思想内容反动的戏”，“黑会”既指形式——秘密，地下，也指内容——反革命、反动。

误植六：

- 中 279：部分农村地区把瘫痪国家官僚机构的副作用当作是伟大的新生事物。

说明：此处将瘫痪当作了动词。这种用法可以出现在文学作品，比如现代诗中，出现在这里不甚允当。这句话似乎这样说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部分农村地区把国家官僚机构的瘫痪所产生的副作用当作是伟大的新生事物。

误植七：

- 中 329：荣誉主席的条款被拿掉了，也许是由于向刘少奇交权失败而已。这种变动预示着毛打算在任上干到老死为止。
- 英 324：The provision for an honorary chairmanship was dropped, possibly as a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 in handing over power to Liu, and this change carried the implication that Mao intended to die in office.

说明：中文别扭。原因就在于那个画蛇添足的“而已”。

误植八：

- 中 363：年迈体弱的毛不能再冒同军队将领反抗的风险。
- 英 358：In his enfeebled condition Mao could not risk a backlash among the PLA generals.

说明：这里的“backlash”是关键词。其意为“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此句中的“反抗”改成“对抗”才通顺。

误植九：

- 中 410：邓小平引用了隐逸诗人陶渊明的词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 英 409：Deng explained: I come from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where they had never heard of the Han, let alone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说明：把 let alone 译成了“何论”并不错。但是，此处引的是《桃花源记》的原文，原文中的这句话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这句名言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也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毕竟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刘邓，何论林江。”

（中 005）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的原话，所以，其误不在作者，而是校者——校者应在此句后面加一个注：文件原文如此。

误植十：

- 中 454：掘墓：平反昭雪（结语的第二个小标题）
- 英 453：Exhumation: Victims Return

说明：Exhumation 的意思确实是“掘墓”。但是“掘墓”在中文里是贬义的。它很难跟后面的“平反昭雪”放在一起。所以，Exhumation 在这里似应从意思上翻译，而不能拘泥于字面。如此才可能与后面的“平反昭雪”相协调。比如，是否可以译成“拨乱反正”？

原著的问题

问题一：

- 中 89：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另一个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通过其女儿平平亲自指挥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
- 英 73：Liu Shaoqi's daughters was at Tsing Hua and another was enrolled ant the girls' 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Liu Shaoqi personally guided the work term at the 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说明：刘少奇确实有一个女儿刘婷婷在北师大女附中，但还有一个女儿刘平平在师大一附中。刘少奇通过其女儿刘平平亲自指挥的是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而不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当时刘、邓有分工，“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记忆》总四十七期，《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又见《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谈话》，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年版。）

问题二：

- 中 135：五十年代初，中共的理论家抨击武训不反皇权，宣传封建文化。

说明：这里的问题在“中共的理论家”和它的注释。在此章的注 18 中，作

者提到“1951 年一调查小组去了武训的家乡……，该小组走访后认定武训是罪恶的，封建的和反人民的。”这些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抨击武训不反皇权，宣传封建文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不是“中共的理论家”。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出自毛的手笔。此文是毛选五卷中的名篇，是研究毛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第二，1951 年去武训家乡的调查小组（周扬负责，组员有袁水拍、钟惦棐和化名李进的江青）对武训的上述结论，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公之于天下了。

问题三：

- 中 168：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这帮志趣相投的人簇拥之下畅所欲言，他举杯祝酒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 中 210：一九六七年夏天，中国陷入了毛后来口中说的“全面内战”。

说明：210 页所说的“后来”并没有译错——英文里确实是 after……。但在事实上错了，比较一下中 168 的表述，就知道，“全面内战”是毛先前说的。

中国人把写史视为最重要的事，将历史学家视为了不起的人。有人问苏轼为什么不写史。苏轼答：写史难，但挑毛病容易。所以不写。译校史书是另一种难——不但要精通两种文字，还要与作者一样具备相当的历史知识。如果苏轼活在今天，估计也不会去干这种苦差事。我曾浅涉译事，深知其艰。在这里曝背献芹，无非是冀望于补苴罅漏，俾完美主义者的作品愈臻完美。

2010-6-10

【史林一叶】

“北大才子” 沈元被处决及其它

王 锐

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谈及，1957 年在北大“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 589 个学生中，文革中被先后处决的有 5 人，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化学系的张锡琨（王友琴《顾文选的

故事》)。

这5位遇难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难最早（1968年4月29日于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数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中在北京被处决的顾文选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内外学者撰文著述研讨其人其事。至于黄中奇和张锡琨，各方情形，至今鲜见披露。

笔者此前探讨遇罗克遇难及“一打三反”相关情形，曾尽力搜集当年原始资料，小有所获。近期又陆续有新材料发掘出来。其中有两份原始文本，就涉及沈元被处决的一些内情甚至具体细节。现披露并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沈元其人其事

沈元，浙江人，1938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同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农村劳动改造3年。1961年摘“右派”帽之后返北京，“因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杰语）。文革中的1968年9月1日，沈元装成黑人，试图进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而被捕。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处决，年仅32岁。

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笔者以为，在沈元不太长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三个“闪光点”。

其一，沈元当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注意，这是当年全国高考的“文科状元”，不是如今媒体每年例行爆炒的这个省那个市“文科状元”之类，而且是没有“注水”的。其含金量大不相同。

其二，年不足20岁时，私下翻译和评议当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对是“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这点，笔者至今仍然叹服有加。在当今有互联网等资讯发达，社会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背景下，沈元此举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全球“冷战”背景以及中国大陆极为严酷的社会及舆论管制情形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政治

敏锐度、胆识和外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

其三，1966年文革爆发，年仅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人物。可见此时沈元史学造诣之深。看过沈元史学论文及研讨史籍的读书笔记的人，都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惊叹不已”（余杰语）。何况，沈元还被送农村劳动改造，中断学业及研究达3年之久。

可以相信，倘沈元当年不惨遭处决，日后极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大师级人物。

上了处决名单又侥幸被“刀下留人”

沈元1968年9月1日被捕，在狱中关了一年多，1970年4月18日才被处决。

为了给中共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为给公审公判作准备及造舆论，执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先后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

所有那一年被处决者，都上过这种《通知》所附的名单。不过，沈元却是先后两次上了这种名单。第一次是1970年2月11日，第二次是一个多月之后的3月24日。笔者所见，沈元是唯一两次上过这类名单的人，不仅在北京市，全国范围也是。相类似的是，遇罗克最初上了1月9日那份名单，因故被“刀下留人”，后来名字又被列入2月11日那份名单，却是被某个大权在握的“神秘人物”临时用黑笔加上去的，所以于3月5日与顾文选等18人同时被处决（详见拙作《遇罗克被处决内情的再探索及其他》，载《北京之春》2010年8月号）。但遇罗克的所谓“罪行简介”却只有一次印上《通知》。而只有沈元是两次上了这种《通知》。

这也得以为后世研究两份《通知》相关措辞的不同变化，留下了难得的原始文本。

先看 2 月 11 日《通知》关于沈元的文字，原文照录：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通知》下发于 2 月 11 日，其时，当局已内定于 3 月 5 日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的顾文选等 55 人予以判决。3 月 5 日北京市果然开了大会，顾文选等 18 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共 19 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 1 人是没杀也没判。

沈元这次侥幸被“刀下留人”，不杀不判，在人世多活了 1 个月零 14 天（3 月份有 31 日），其具体原因，笔者仔细探讨后，认为可能有二：

一是 3 月 5 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所以将沈元留在了下批处决者中，这才出现了 3 月 5 日唯一对沈元既未杀也未判的情况。笔者在《遇罗克处决内情再探索》一文中提到那份经某位“神秘人物”用笔（红、黑色水笔及铅笔）删改批定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2 月 11 日《通知》，第 2 页正文部分（即案犯姓名及所谓“罪行简介”）左上角有用铅笔批注的“16 人”字样，笔者曾分析这是“北京公法军管会”当局或北京市革委某个实权人物，预先确定的“处决人数”指标。后来，那位神秘人物在案件姓名前打“√”记号，并用黑笔在“简介”文字之后批上“死刑”或“死”字样，表明这是此批处决者时，从顾文选一直数下来，已经多达 19 人，加上新添上的遇罗克，已达 20 人。所以，那份 2 月 11 日《通知》名单上这位“神秘人物”的批注和作“√”记号，恰恰到沈元那里就嘎然而止。沈元在名单上列案件序号第 19 位，而列案件序号 18 位的“反革命杀人犯”韩仲才和齐桂兰（女），其姓名和序号前都有“√”记号，

罪行文字简介后又批有“死”字样。

二是“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作出这个推论的依据，就是笔者在后来仍然被某些“神秘人物”批注过的3月24日那份《通知》所附名单上，在沈元名字及简介后发现有黑笔批注的“死缓”字样。这说明当年有人确实对沈元提出过判“死缓”的意见和主张，可惜最后未被采纳。

两份《通知》的文本解读和比较

但沈元的这次逃脱处决的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难逃。

笔者有幸搜集到这两份《通知》原件。比较一下2月11日的《通知》和3月24日的《通知》文本，是很有意思的事。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当局是如何遵中共中央指示（更多是周恩来意图），努力为正全面铺开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做“样板”的。

2月11日《通知》正文如下（两段相关毛泽东语录省去）：

通 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

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一个多月以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 3 月 24 日《通知》（略去毛语录）全文如下：

通 知

为了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遵照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教导，现将张华民等八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印发各单位，望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组织广大群众讨论。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必须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同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请将讨论情况和对上述罪犯的处刑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注意保密，不要遗失。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仔细解读和认真比较两份《通知》文本，大致有以下区别：

其一，“打击”规模、声势和力度继续加大。2 月 11 日《通知》公布并供讨论处刑的是“顾文选等 55 名罪犯的材料”，3 月 24 日《通知》公布并提交讨论处刑的是“张华民等 85 名罪犯的材料”，人数上多 30 人。

其二，试图将“一打三反”运动往纵深发展。

3月24日《通知》较2月11日《通知》文字长得多，增加了许多内容，如“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又如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当然，也说了区分两种矛盾，实行宽严政策等。这个通知，表明了周恩来要将北京市作“样板”，将这场“一打三反”扩大化，纵深化（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以至持久化（深挖隐藏敌人）的政治意图。

其三，让北京卫戍区介入“打击反革命”。

3月24日《通知》上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这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表明当局正式让北京卫戍区介入到“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来。

北京卫戍区在文革中是很重要，也很特殊的一个单位，对于保证文革的发动和顺利运行“功不可没”。北京卫戍区除随时执行中央交办的一些特殊任务外，还以“监护”名义，拘押着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北京卫戍区当时不仅脱离北京军区建制，而且脱离总参和中央军委调动指挥，只有两个人可以直接指挥调动，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无权指挥调动。让北京卫戍区介入“打击反革命”行列，是意图增强“打击反革命”的权威性和力度。1月9日和2月11日《通知》上没有北京卫戍区字样，前两次“公审大会”也没有北京卫戍区参与主持，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果然，4月18日处决沈元等人的那次“公审大会”，北京卫戍区就正式成为主持者之一。这显然是周恩来的安排。

3月24日《通知》对沈元“罪行”措辞的微妙变化

沈元在上次“刀下留人”之后19天，又被当局上了3月24日的下发的相似《通知》。笔者仔细比较，这次《通知》上沈元的所谓“罪行”措辞行文方面，有了一些微妙变化。研读起来，很有点意思。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

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简介”，由两个自然段组成。第一个自然段，改动不大，仅将最后一句“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罪”删去。原因不明，且意义不大。

关键改动在第二段。首先，将前份《通知》中，“并企图叛国投敌”，改为后一份《通知》中的“积极策划叛国投敌”。这一改，同样事实，所谓罪行就严重得多了，“企图”还是只有意图，并未实现，“积极策划”，则是又主动、又积极，大不一样。措词者果然“妙笔生花”。以前常说“以笔杆子杀人”，这可算一例。

其次，“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大使馆”一句，在后一份《通知》中，改成了“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闯入了”改为“投靠”，性质明显不一样。“闯入”，其动机尚不明确，可作多种解释，“投靠”，则是有明确目的，属定性词语。

最后一句的“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为“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对文革的所谓“污蔑攻击”一词，一律改为“恶毒攻击”。所谓“恶攻”罪，是文革中最严重的大罪重罪。

另外，在案件序列号上，前一份《通知》上，沈元排第 19 位。3 月 24 日《通知》上，沈元排名第 17 位，提了两位。按惯例，排名越靠前，当局认为其“罪行”越严重。

3 月 24 日《通知》上这番改动，已经表明沈元这次是在劫难逃。

《通知》文本上的批注显示对处决沈元曾有争议

笔者得到这份北京市公法军管会 1970 年 3 月 24 日《通知》，也不是一份普通印刷文本，而是有特殊价值的原始文本。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过《遇罗克处决内情再探索》详细解读过的那份 2 月 11 日《通知》文本一样，是被某个或某些内部高层人物批注过的特殊文本，颇有研究价值。

经笔者初步分析解读，这份被批注的文本有以下特征：

其一，封面首页右上角，用铅笔写有“讨论”二字，似乎表明这份文本是北

京市革委会或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内部讨论定刑并记下留存讨论结果（定刑意见）的原始文本。

其二，内文（即案犯姓名及所谓“罪行简介”）部份，有个别文字之下有用铅笔划的横线及批注字样。如第2页第1个案例“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华民”，在简介文字之后，有铅笔批的“死”字样。同案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白满囤”，其中“骨干”两字之下有铅笔划的横线，简介文字之后，亦有铅笔批的“死”字样。同案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齐国振”，其“骨干”二字下，亦铅笔划有横线，正文之后，有铅笔批注的“无期”二字。同案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石宝丰”，简介文字之后，有铅笔批的“十五年，剥五年”字样。分析这些文字，大概是表明，对石宝丰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再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案例1与案例2之间的文字空白处，另有黑笔批的一行小字：“张、白、齐死，石死缓。”这似乎表明最终结果是，张、白、齐3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4人中仅原定判刑15年的石宝丰被判“死缓”。最终是4人中的2人还是3人被处决，要看当年判决书方可确定。

另有意思的是，案例4“现行反革命犯雷翀云”，大概因“翀”字属于冷僻字，特用铅笔在其上注了个“冲”字样，意在提示“翀”字读音为“冲”。

这个时年42岁的雷翀云，其实算是文革时期的“上访者”。从材料上看，其时在陕西某地，1969年12月与其妹雷淑君来京上访不遂，在长安街张贴散发传单数百份。没料被捕后恰逢“打击反革命”运动，丢了性命。其妹、26岁的雷淑君，从黑笔文字批注看，先是判“死缓”，后改为“无期”。令人扼腕。

总的说来，整个76个案例85名“案犯”中，用铅笔作的记号和文字批注都不多，绝大多数批注用的是黑笔。由此，似乎也可以推断，在文本上作审定批注和记号的，不只是一人，可能是两人甚至多人（字迹也不尽相同）。

其三，这份《通知》上公布的85人，每个人简介后面均批注有判刑结果，如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或1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这85人，未有低于12年刑期的判决，哪怕普通的盗窃犯）。这与笔者提到的2月11日那份被批注过的《通知》不同。2月11日那份《通知》的批注，只涉及立即处决的死刑，连“死缓”案犯亦未予以相关批注。

其四，这85人中，被批注“死”字样，表明将遭立即处决的，笔者依次统

计，大约在 24 至 28 人之间（因其中有些批注是多种，如有人意见是“死刑”，有人意见是“死缓”，甚至“无期”）。其中除确为杀人强奸等刑事犯罪外，属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政治犯，大约有 18 人。其中宋振明、王作臣属于 1949 年之前的“历史反革命罪”。与沈元同为“现行反革命叛国罪”的有 3 人，其他二人分别是水电部海河勘测设计院助理技术员董逢春（35 岁），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管理员苍树德（37 岁），是已成功出走后被引渡回国，惨遭处决者。

其五，在这份《通知》中，批注的内容显示出来存在某些意见分歧，或说对处刑的结果意见不一致。笔者仔细辨认，其中有多达 7 人的不同意见批注（每个人均以姓氏代表，分别有（按出现先后）：张、周、崔、刘、庞、石、杜等，除“刘”一人，笔者推断是当年大权在握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外，其余数人，不知指的是谁，待考。

正由于有多人参与其中，所以，同一个“案犯”批注处刑意见，各不相同。如案例第 13 的 43 岁的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职员马福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刑时，其文字之后，最先批注的是“死”字，之后，又写有：“张死缓，无期。石、崔死缓”字样。分析这个批注表明，对马福昌，最先有人认为应判“死刑立即执行”，但张姓人士的意见是判“死缓”甚至“无期徒刑”。另外，石和崔姓人士，两人意见都是判“死缓”。因此，最后这位北钢图书馆的马福昌（从文字简介看，也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文革思想者”，写过 40 余封匿名信评说文革及一些文革当权者而致祸）。其最终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得看当年“判决书”，或是当事人回忆。笔者亦望知情者提供相关情况。

这里就说到本文主人公沈元。这份文本上沈元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也是这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沈元终于 4 月 18 日惨遭处决。

沈元殉难于专制和极权

21 世纪以来，沈元其人其事渐受海内外学者、知识界人士瞩目。刘再复、余杰等都有专文缅怀沈元，并有相关评说。沈元当年旧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诒瑞女士，更是于 2006 年编了一册题为《难以纪念的纪念》的文集，纪念追忆沈元。

刘再复在题为《面对高洁的亡灵》的文章中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余杰在《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中，沿着刘再复的思路和追问，评说道：

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者”的“后文革时代”，刘再复以罕见的真诚打破了“无物之阵”般的、厚厚的沉默，他从当年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反省、开始追问：“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呐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够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得过去呢？受‘蒙蔽’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丑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那些以知识、文化和思想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也是凶手、承认自己内在的恶是如此丑陋呢？”

他们从反思文革，进而探讨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和“集体无意识”，以及追问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其出发点应该是不错的，其中也不少真知灼见。不过，他们两人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对沈元死因的探索拷问，笔者并不赞同。

道理很简单，因为沈元不是如卞仲耘等人那样，死于文革之初那种因文革思潮和“暴力文化”煽动起来的群众暴力或“红卫兵暴力”，而是死于崇尚专制和极权的国家政权之手。换句话说，沈元（包括林昭、遇罗克、顾文选、王佩英、

马正秀，到以后的张志新、王申酉等思想者先驱者），是被国家政权，以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性理由，通过所谓法律程序，以国家之手、法律之手剥夺其生命的。这是当权者借助国家机器，试图将那些有“异端思想”或“异端行为”的人，从肉体上整体消灭。两者性质应当是迥然不同。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的法律是以高压而不是以智慧来统治中国人，由此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大地上的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进一步认为，缺乏自由度和自由精神，是造成被国人引以自傲的“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的原因之一。这些先哲的见解，值得国人深思。

到了现当代，国际社会要求废除死刑的呼声渐高。罗伯特·巴丹戴尔，是当今法国著名律师，后来做了法国参议员和司法部长。他是推动法国废除死刑法令最有力也最有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目前致力于全世界推动废除死刑。2006年下半年，我国知名学者叶知秋在巴黎拜访过他，并就废除死刑展开访谈对话。其间，巴丹戴尔先生对死刑与专制主义和专制政权的关系作了很精彩的阐释。

巴丹戴尔首先引用一句雨果的名言：“死刑是残酷和专制的一种永久性的标志。”然后，他一针见血评说：“毫无疑问，死刑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永远的记号，因为死刑肯定了国家对于公民的绝对权力，反复地肯定。法律通过各种具体的标准和细节，为国家争取这种判处死刑的权力。”他还解释说：“是否杀人，这是国家和罪犯的区别。最绝对的权利，就是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

最后，巴丹戴尔先生尖锐地指出：“死刑把人类的偏见最大化地带入审判之中。通过死刑，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因素都被放大了。”（以上见 2006 年第 31 期《南方人物周刊》叶知秋《你见过死亡的颜色吗？》）

这里借用巴丹戴尔先生的思路和逻辑，笔者认为，文革中当局对沈元的处决（还包括林昭、遇罗克、王佩英、马正秀等等成千上万遇难者的处决），是当权者将那种“人类偏见”最大化地带到当年所谓的“审判”中，而且将中国社会本身存在的“不公正因素”，不仅仅放大，而且推到了极致。

沈元至今在北大被冷落

笔者认为，沈元和林昭等人一样，不仅是“北大才子”，而且是在他们身上

真正传承着“北大精神”、寄托着“北大人”的“光荣和梦想”的先驱者，是敢于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斗士和勇者。

可惜，在当下的北大，沈元至今仍遭到冷落。余杰在文章中感叹：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

这是相当令人不解，也相当令人失望的。在物欲横流，全社会浮躁，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普遍丧失的当今中国，要年轻学生们去关注和关心与他们的分配、就业乃至房子、车子全然无关的学长，似乎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北大当局是不应该不记得，北大曾经有过林昭、沈元这样的学子的。前些年北大隆重庆贺“百年校庆”，还编有《北京大学记事》、“北大百年编年史”之类。笔者没见过相关资料，不知在这些资料中，是否给予了真正传承着“北大精神”的林昭和沈元这些思想者、先驱者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或是干脆也是只字不提？

对北大当局也好，北大学子也好，关注 GDP 和财富的增长，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以至衣袋里的银子，也没什么不对。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知名高等学府，总还得有人来“仰望星空”，得有人来关注那些物质财富之外，科学、艺术的创造，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文关怀，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笔者以为，林昭和沈元，就是属于“仰望星空”的人。

正由于此，笔者以为，有理由在未名湖边，给林昭和沈元这些人立塑像（正像有人已给遇罗克、张志新立塑像一样）。而且，笔者相信，在北大校园里，在未名湖畔，一定会有林昭、沈元等的塑像竖立起来。即便是我这一辈人看不到，我子孙那一代，或许将能看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于自贡危楼书屋

【简讯】

《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出版

高 原

描述所谓“林彪集团”案中排名第二的军人——黄永胜大半生征战生涯的纪实文学作品《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日前在香港出版。

本书作者黄正，原名黄春耀，又名项群，是黄永胜将军的三儿子。文革前曾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毕业后在军队服役，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转业。黄永胜1981年“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时，被批准随父到青岛生活，照料他的晚年，“与父亲一起面对一个震撼历史的困惑”。有感于“在建国以来所有出版物中，没有父亲的传记，没有他的生平回忆录，没有完整描述他一生的作品”而又能力所限（主要是没有条件去接触尚未公开的作战档案），“只能在公开的资料中慢慢查慢慢找，一点一点地与父亲还有母亲多年来断断续续讲的历史上的事，以及他的老战友们断断续续讲的往事故事，渐渐对接起来，将这些活资料镶嵌在纲目一般的战史中，渐渐扩展成为这一篇文字。”（黄正《写在后面——作者的话》）

本书共十一章，主要篇幅展示的，是黄永胜自1927年6月参加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并随部参加中共领导的秋收暴动，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程。

仅序章及尾章两章，为文革中及文革后的简要叙事。这两章揭示了黄永胜1968年至1971年间的经历和心态——从“杨余傅事件”时被周恩来一个电话召至北京，1969年“九大”期间毛泽东拟将其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九一三事件”的突然发生。虽然着墨不多，但由与父亲晚年做过多次深入长谈而又有一定文艺功底黄正——道来，却也十分传神。

这本书是黄永胜将军的“前传”，人们有理由冀望，披露更多文革高层内幕的“后传”能早日面世。

【简讯】

[《亲历“文革”——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即将出版](#)

[魏曙明](#)

文化大革命之初，鉴于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就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中央办公厅、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以及各军种、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共200多名干部，组成了中央文革记者站。这些干部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的名义，派驻到全国名省市区所在城市、问题突出的中小城市、重点工矿交通企业、商贸口岸和农村社队，调查运动和生产建设情况，直接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使中央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情况。

这个记者站后期，因人手不足，又吸收了一批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和联络员，协助记者调查采访，整理摘编上报各地来京人员的汇报材料，接待上京汇报人员。记者和学生调查采访的层面，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行业。

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名义受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办事组）领导，中央领导经常亲自过问，具体指导。毛泽东、周恩来仔细审阅了记者站印的《各地动态》、《快报》、《简报》及记者信件，做了大量批示。批示后的材料，有的做中央文件下发，有的加上按语，配发社论，在“两报一刊”上发表，指导运动。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人，抓记者站的工作更为具体。他多次接见记者站全体人员，做重要讲话，交代任务，为记者确定工作方针、原则，及时纠正记者工作中的问题，还多次听取记者口头汇报。他让记者参加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会议，了解中央的精神，汇集上报与会人员反映的大量情况，还派记者去接待群众，制止武斗，做各地群众大联合的工作，给被围攻的领导干部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央文革其他人，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及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等也对记者做过指示，下达任务，听取汇报，还审查过记者的稿件。这些记者接触的上层情况是多方面的。

记者始终处于运动第一线，下到最基层，他们参加中央的会议，各省、大军区常委会议，更多时间则是在工厂车间、农村田间地头、各派群众组织之中、关押干部的“牛棚”和武斗现场……广泛接触党政军民学各界，各种职务、各种观点的人。在这些人中，既有群众组织的成员，也有被斗的领导干部和军队“三支两军”人员；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和逍遥派，既有中上层人员，又有大量最基层的普通人。他们既调查文革运动，又了解生产建设；既了解正面经验，也调查负面问题。记者接触广泛，视角独特，见闻丰富多彩。报道中的观点，因受文革指导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多有片面、偏颇之处，但调查报告中列举的事实，基本是符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记者是文革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当年的这些记者现在大都七八十岁了，他们想趁身体尚健、记忆尚好，把自己的见闻撰写出来，公布出去，不使其散失、湮灭，以供研究。他们的当时笔记本大都已上缴；当年写的东西，存在档案馆里还没解密。现在只能靠回忆和手头的有限资料进行写作。写出的材料，虽不足当年见闻的百分之一二，也应对文革研究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此书由当年的记者肖健卿、李近川主编。因涉及当时的 29 省市区的 26 个省市，计划出版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拟出的第一册，收录正文 23 篇，附文 4 篇，包括记者站的沿革、文革大事的起因、发现调查“五一六”集团的经过、地方一些重大事件的经过、阎红彦之死、刘结挺和张西挺的问题、文革中的许世友、林江集团的破坏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情况等等。

【闲读偶记】

写在《亲历“文革”——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即将出版之际

徐海亮

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工作人员是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的记者名义，调查各地的运动和生产，按照中央规定向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真实、全面反映各地运动客观情况。后期因人手不足，又吸收一小批在

校大学生，如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董某，清华大学的王、张夫妇，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龚某等人，作为群众通讯员或联络员参与。

该书的酝酿、发动和撰写，始于 1990 年代。2002 年，李近川率先在《百年潮》上发表了《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一文。在这些记者中，李近川是比较年轻的一员，也是一个难得的有心人，他始终保留了一份当时的记者花名册，凭借这个名册，一一寻找当年来自部队各单位，后来又归队或转业，已经离退休，分散各地的同事。在联系与发动的过程中，各位老记者发掘记忆，查找了原始记录和参考资料，重新撰写的文字逐渐增至 40 万，其中部分文稿在有关刊物发表。

2007 年 10 月，掌握记者站情况较多的同志聚会北京，欢叙今昔，交流切磋，决定核对与修改已写出的材料，并进一步征集史料，争取编撰成书公开出版。

2004 年，前来参加社会科学院学术会议的瑞典汉学家沈迈克教授提交了《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文。我被邀与他对话，才初次接触到这一重大专题。对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如何收集信息和形成政策、处理问题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此后，我通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卜伟华，找到正忙于联络、组织记者的李近川同志，逐渐知晓文革中这个颇带神秘色彩的工作班子的实际情况，进而在 2007 年列席参加了这个 40 年以后的战友、同事的聚会，接触了这一记者群体，阅读了他们带来的数十篇初稿。

通过阅读这些文稿，我弄明白了当年不清楚的一些问题，了解了他们在文革中所处的地位、受到的纪律约束、历经的艰险，以及他们个人的遭遇。他们的淳朴、热忱、真诚、默默奉献的品质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当年是涉世尚浅的学生，军人和记者职业在我心中一直是神圣崇高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情和正直。不论当年的派别斗争如何激烈复杂，历史在当时和后来如何被解释或指认，他们都恪守客观记录、不陷入派性的职业准则，坚持道德底线，恪守党纪国法。

两个月前，李近川同志告诉我原来武汉记者站的老姚的踪迹。我们已经找了他好多年了，这次终于联系上。当我告诉老姚，我当年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学生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学校当时跟他跑调查的龚某现在何处。他还清晰地记得，当他们被不明真相的狂暴群体围攻绑架，我们学校学生把他藏在老师家里，他也清晰地记得老师夫妇姓名，甚至是教什么课程的。他告诉我，他当时的

确是总理的联络员，负责做群众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和筹备革委会。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仿佛故交旧友，一种对国家、民族历史负责和对他人尊重的精神，通过电话温暖着我的心田，我的眼湿润了。

李近川同志如今每隔一日就要做一次全身血液透析，他在病中始终坚持联络、组织和文字修改、送审工作。编者在后记中指出：“收入此书中的材料，仅反映了部分记者的见闻，只是全站人员接触见闻的极小部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更多当年同事行动起来，积极参与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回忆披露出更多的史实，通过文字保存下来，留给后人，避免失散湮灭。这是我们这些曾站在‘文革’第一线，亲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的确，留下亲历文革的史实，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

【忆旧思亲】

忆父亲吴天石

吴允弘

2010年阴历一月二十九日是父亲吴天石的诞辰100周年。

在1966年8月5日，爸爸才56岁，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了。40多年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们多年的调查，认定爸爸妈妈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当时爸爸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妈妈李敬仪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爸爸是因为他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中央的某报刊要提前发难，而在江苏被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批判打击对象之一。

1966年8月3日晚9时左右，天气极其闷热，当时，妹妹作为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常住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和学生“三同”。一个弟弟在南京无线电校住宿。上初中的两个弟弟都随他们各自的学校在农村劳动。我和另一个弟弟分别远在石家庄和北京。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和老保姆。南京师范学院的“左派”学生，在一些极端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下，冲进我家，把爸爸、妈妈拉到南京师范学院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分子大会”。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高帽子（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他们的头上。接着，

又拉他们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开始时，妈妈和爸爸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在发烫的马路上被横拖着走，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路。妈妈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爸爸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毒打时，有人问：“吴天石，你是黑帮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是共产党员！”又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中国人！”这样铁铮铮的回答招来了更大的摧残。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得到消息后，立即叫省委组织部长辛少波去医院探视。经检查，爸爸双臂被扭成骨折，另有五处骨折，双



腿被拖成瘫痪，身体外露部分的汗毛孔被墨汁和灰尘封闭，形成了脑水肿。由于爸爸伤势过重，一切努力都已经晚了。昏迷两天后，爸爸在8月5日含冤去世。妈妈李敬仪和爸爸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左图：吴天石夫妇遗像。）

爸爸妈妈遇难后的几十年来，爸爸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老上级，接触过的教师、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文艺界的朋友和各方面的同志等等，用生动的文字，深入的分析 and 充沛的感情，写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文章。使我们知道了爸爸许多为人民所做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使我们对爸爸有了更深的了解。

1949年渡江前，我年龄还小，很多事情记不起来，很多事也不知情。渡江后，我上小学六年级，就在学校寄宿，以后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住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和爸爸、妈妈接触的时间很短。他们在工作单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从不和孩子们谈论。以下只是我对所知所见的一些片断往事的回忆。

—

1910年，爸爸出生在长江北岸靠东海边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偏僻小城南通。我的祖父是独子，在南通天生港海关当小职员，平时住在海关，节假日才回家，

业余时喜欢看些中医药及阴阳、风水方面的书，到现在还留有一部李时珍的石印本《本草纲目》。我还见到过祖父用过的看风水的罗盘。祖父在爸爸 11 岁时得急性传染病（据说是霍乱）去世。这样，家中除几间门面房的薄租外没有了其它经济收入，陷入了困境。家里没有了主事的男人，房租也难收到。祖母吴陈氏，小脚、文盲，但深明大义，有主见，全力培养孩子读书。爸爸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旧社会只有男孩才能算家中人，爸爸是家中的独子，很受重视，是全家的希望。爸爸说：他小时候很聪明但很顽皮，爱看闲书、斗蟋蟀等等，在小学校里读书不认真。祖母非常伤心，大打了爸爸一顿，说：“如果你要继续上学，就好好读书，不想读书，就去当学徒学做生意。”爸爸表态要继续上学。

从此爸爸认真读书，国文成绩特别好，记忆力也非常好，因此李俊民说爸爸有“过目不忘之才”。小学毕业以后，上了在苏中地区有名的南通师范，当时上师范不要学费，还管饭，家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爸爸在读师范（中学）时已小有名气，师范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专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高等学校，当时的馆长是清朝的进士、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爸爸的同学有郭影秋等。1932 年在无锡国专毕业后，爸爸还专门到南京龙蟠里著名的国学图书馆“陶风楼”看了三个月稀有的馆藏书。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深入学习，中国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与道德传统、人文精神，对爸爸有极深刻的影响，影响了他一生的言行和他的教育思想。解放后到南京工作，爸爸还特地去龙蟠里图书馆旧地重访过。可惜，改革开放后藏书都已搬走，现在此图书馆原址也已拆除，影踪全无。

爸爸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经顾怡生老师介绍，在南通崇英中学找到了一个教职。但工作一个多月后，就因写了不少激烈的文章，上海进步团体给他邮寄材料等，被人密告，而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开始时，有人耽心忠厚笃实的爸爸经不住敌人的折磨。但爸爸幼年时的同学、好友李淡人去狱中探望过两次，都见他镇静地坐在铺了稻草的地上，神态自如。被关八十多天后，经老师、好友、同学们尽力奔走。祖母几乎变卖了所有家当，花了大钱才营救出狱。爸爸出狱后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从书本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屠杀青年的话，至此，算由亲身经历，真正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

出狱后，爸爸被反动政府驱逐出江苏。他得到挚友李俊民的帮助，远去山东教书。爸爸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在 23 岁时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第一年只教了三、四十天的书，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后来家里用了很多钱，才把我保出来。你的祖母的头发为此白了很多。但是我更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我认识到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实现，子子孙孙才能得到幸福。”

(右图：青年吴天石。)



爸爸在 20 岁时即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30 年代初爸爸被逐出江苏后，曾经在山东多所中学教书，是很有影响的语文教师，著名的进步教师。因宣传革命思想，曾多次被解雇。他曾在济南乡村师范（解放后被称山东红大）担任国文教员，当时的学生中有后任云南省长的赵健民、农机部副部长景晓村、新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景晓村回忆爸爸在济南乡师上课时讲到东北的沦陷，声泪俱下，极具感染力。山东党史有关资料提到 30 年代山东学运中“对山东学生影响较大的进步教师有楚图南、胡也频、田在村、范明枢、马适安、王翔千、武新宇、吴天石、王溥泉（刘顺元）、路雨亭、田仲济、田佩之、王哲、何其芳、马霄鹏、李竹如、刘宪曾、于云亭、高文甫等，他们是指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抗战前夕，爸爸和好友、地下党员顾民元、江上青（江泽民的继父），以及于在春、江上青的弟弟江树峰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此刊物在抗战爆发后停刊。抗战开始后爸爸回到南通，在南通、如皋等地农村直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0 年 11 月，还曾和梁灵光两人只带一个警卫员，去接管了南通伪县政府，建立了南通县抗日政权。改革开放初期，梁灵光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时来南京考察，爸爸的老朋友施亚夫带我去看他，他还特地详谈了这一历史事件。但爸爸一直没有要求入党。爸爸后来在整风时说：“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在苏中抗战最艰苦的 1943 年，日寇在与上海隔江相望的苏中四分区重兵重点清乡，到处建起了封锁线和碉堡，还用竹篱

笆分割各小区，抗日根据地中不少革命不坚定者投敌或逃跑了。这时爸爸却正式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是陈伟达和赵毓华，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钟民。钟民在改革开放后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伟达在改革开放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不久，爸爸就随夏征农离开苏中四分区，赴三分区的宝应地区，去新建苏中军区苏中公学，任政文教育主任兼宣教科长。其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夏征农是苏中公学的教育长，大家尊称他为“夏老师”。爸爸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工作生涯，教育和培养了上万名革命干部。

二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他的职位现在看来是“高干”。但他从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当“官”，而是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他在江苏省负责教育工作13年（从1954年到1966年遇难为止），得到广泛的好评。他安于本职工作，从不想升官。中央教育部和华东局（统管华东六省一市）都曾准备调他去，都被他辞谢了。他常说：“以后不做教育行政工作了，就回归老本行，去当教师教书。”他当教育厅长时，就常去各地的学校听课，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斯霞老师的课，他就听过几次，发现了这个典型，亲自写了介绍文章。江苏南通的典型、特级教师李吉林，也是他发现的。他还亲自主持召开全省语文教学座谈会，总结经验，在省里推广，以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他还准备到学校去兼课，但由于工作太忙，上了几次课以后，无法坚持下去，才不得不停止。

爸爸心目中的教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为分数、为升学率服务的片面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普遍教育，而不只是精英教育。在普通教育内容上，他主张知识的全面学习，反对偏才或专才教育，反对过早的专攻一门或文理分科。

爸爸反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好坏的指标。当时中、小学不分什么省、市、区重点，什么4星、5星、示范学校，重点班等等的等级，没有各种名目的评比，也不统计升学率。那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教育经费很紧张。对于省属学校，没有听说有什么经费上的特别照顾。我上过学的苏州高级中学、常熟中学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都是江苏省的顶级中学，当时就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而当时爸爸对农村学校的经费则尽力争取。1961年有一次，我直接听到爸爸当面向省长惠裕宇争取农村学校的经费，惠裕宇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大肥肉可以随便吃

了，就可以多给你经费了。”

现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舍建筑，比英国的新建的大学还要高级，接待室比高级宾馆的会议室还要漂亮。其它学校校舍也得到很大改善。仪器、教具等等也都现代化了。电化教育也很大地普及了。这些都说明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不是在 1961 年时所想往的“大肥肉可以随便吃”的时期了。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只取决于这些。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理念、品德教育、教师水平、教育系统干部的水平 and 事业心等方面，是更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方面可能还不如五、六十年代。

爸爸主张学生的学习要全面发展，不能偏科，德智体也要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1957 年我在南师附中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为了应付高考，最后一个学期里，有不少同学放松了副科学习，专攻考大学要用的学科、专攻难题。我回去问爸爸这样做好不好。他说：“学习还是要全面发展。”我坚持这样做了，毕业时各门功课都是 5 分（当时采用苏联的 5 分制，5 分是最高分）。以后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国外和国外的学者相比较，才体会到“全面发展”的好处。对于科研工作，爸爸也主张“由博返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在研究工作的同时，重要的是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现在基本功深一分，将来即受用一分。做学问是要由博返约的，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然后专精一门，才能真正专下去。”在学习方法上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学习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1949 年，他回访母校无锡国专时，演讲的题目就是“死读书不如不读书”。

作为他受批判和遇难的直接导火索的，是他和马莹伯在六十年代合写的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这本书是他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总结，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归纳。该书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很受青年的欢迎，因而非常畅销。还在五十年代时，我在苏州，在夏天晚上乘凉时，多次听到他向来访的朋友介绍过他的这些想法。以后到了南京，和教育家吴贻芳同住在四条巷，在夏天晚上乘凉时，也多次听到他向吴贻芳介绍过这些想法，以及准备写书的内容，吴贻芳很赞同。

前几年，有一个老师说：“这本书教育了我家三代人。”这本书不仅介绍古人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去除封建糟粕后，古人的尊师重道、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习精神。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却被批判为爸爸

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总结。

三

爸爸在教育厅的工作重心是中、小学普通教育，特别是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在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农村小学生升学和提高文化水平的现实困难，在党中央、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他还特别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农业中学付出了几年的心血。没有教师，就从城市里招高考落榜的高中生，经短期培训后担任。没有经费，就在农村人民公社协助下，由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劳动生产，解决经费问题并结合劳动生产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几十年后，当时的农业中学教师还说：“吴厅长为农村普通教育的发展办了实事。”

爸爸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力，没有好教师就办不好学校。他很关心普通教师，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要使教育厅成为教师之家。

有一年爸爸在苏北，到淮阴刘老庄附近农村学校视察，乘一辆小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黄土小路上压死了一只小猪，因急于赶路，一些同志提出等视察完成后，回来时再找农民赔偿，爸爸不同意，他说：“一只小猪对一家农民来说就是大事，我们现在走了，他们会以为我们不赔了。”按爸爸的意见找农民赔偿小猪后，才继续赶路，虽然迟到了，还是完成了视察工作。在爸爸看来，人民群众的事都是大事。

同样，在爸爸看来，普通教师们的事也都是大事。有一次爸爸去苏北视察工作，遇到一位 50 年代复旦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一所中学教俄语，这位素昧平生的知识分子找到他诉说苦衷和抱负，希望能调到一个能发挥其专业作用的地方工作。回南京后，爸爸就着手为他联系，终于使他如愿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

我的大姨夫和和大姨妈在南通市工作，他们的独子在如皋一所中学教物理。50 年代初，他们希望爸爸帮助他们把独子调到南通市工作，爸爸妈妈做他们的工作说：“这样的情况很多，你们也不是最困难的一家，以后再说。”过了几年以后，姨夫姨妈老了，我的表弟才按照政策调回南通市某中学工作。对此事姨妈一直有意见。

乐瑞丰是我的高中同学，爸爸并不知道这是我的同学。乐瑞丰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苏北农村教书，他家在南京远郊的贫困农村里，有 11 口人，只有他父亲一人可劳动，非常困难，他想调回来帮父亲撑撑快要倾倒的家。他后来回忆说：“1963 年的一个夏天，我带着无望的心情，走访了省教育厅。说出了来访的目的和困难。当时吴厅长带着同情、关心和理解接受了我的申请。两周后，我接到了回信：文已下发，回校办手续。我们全家都震惊了。感激的泪水，唏嘘的哭声，融成一句话：吴厅长，你救了我们一大家子了。1963 年底，我回宁了。我带着吴厅长的鼓励和希望，又走上了讲台，从事我的执教工作。我辛勤的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学校与学生的认可和嘉奖。”直到我们班开毕业 50 周年同学会时，乐瑞丰才知道吴天石是我的父亲。

我的高中同学蔡抚民，高中毕业后，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曾任国民党军统的中将）没有被大学录取。他经过徐州师范学院的短期培训后，分配到苏北的贫困地区睢宁县农村任农业中学教师。他工作努力，肯动脑筋，工作中成绩突出，还向我父亲写信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很受重视。我父亲曾亲自向我说过此事。因他的突出成绩，当选为江苏省农业中学优秀教师，出席了江苏省农业中学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并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他。

爸爸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关心、爱护和帮助优秀人才。对待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诚恳尊重。爸爸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则相处很好，从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

钱仲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清诗专家，爸爸在无锡国专的学长，解放初因为一些“历史问题”不能在大学教书，爸爸深知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爱惜人才，将他连续调换几个单位，最后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完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和主编了 1200 万字的《清诗纪事》。钱仲联先生在爸爸逝世二十周年时，特赋四绝句悼怀：

赤马灾年记逝年，十年月缺十年圆。

欲将长恨为冰魄，伴汝精魂到九天。

树人树木百年心，革命还须士若林。

教育一生全为党，至今桃李尽成荫。

腥风血雨石头城，学圉何堪此体横。

有项不随胸骨折，浩然正气群魔惊。

同学梁溪久见知，春兰秋菊不同时，

激泉泪尽悲难尽，诉与回肠七字诗。

著名作家高晓声、宋词在极左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爸爸对他们还是时常记挂在心，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联系，给他们帮助，“四人帮”倒台后，他们都得到平反，写出了很多作品，做出了成就。

爸爸刚到省教育厅时，厅长是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国际知名人士、民主促进会江苏省主委吴贻芳。副厅长有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副主委古楫。五十年代，我家和他们两家同住在四条巷的一处小楼。爸爸是副厅长、党组书记，负责全面的工作。但他对民主人士很尊重，让他们有职有权，相互肝胆相照，相处很融洽，受到了省委统战部的表扬。在那因言可以致罪的年代，吴贻芳谈到她和爸爸的关系时说：“在天石面前我是什么话都敢说的！”不久，吴贻芳调任副省长，爸爸转任厅长，但对她仍然很尊重，有机会就向她汇报工作。有一年春节我和爸爸到她家去拜年，就听到爸爸当面向她汇报近期教育工作的情况，使她很感动。

爸爸在工作中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长期相处，志向相同，成了知心的好友。陈光是负伤四次的老红军，为人正直，对同志热情，对普及农村的教育极其热心，爸爸很尊重他。但他们是君子之交，从未谋图过私利。陈光在文化革命中饱受迫害和摧残。1976年，当他被解放回到南京不久，就请我到他在太平路的临时住所去见面。我见到他已病容满面，我按习惯称他“陈光同志”，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泪流满面，竟相对无语。1984年陈光由北京回南京养病，在病中还满怀深情地写了回忆我爸爸的长篇文章，内容深刻、感人至深。两年前，时年89岁的陈光夫人陶云霞还对我说：“吴天石是陈光最好的朋友。”

四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打骂，不疾言厉色。对学历也不硬性规定，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从不要求他们以后当官发财，而要求孩子们成为普通的文明、正直、有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尽力的人。



(左图：对新中国与新生活充满向往的吴天石夫妇。)

1948年4月，由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扫荡苏北，爸爸带华中公学四、五千人，由江苏盐城东海边的陈洋子一带北撤山东，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则在后面追赶，直到接近陇海铁路，黄伯韬兵团才转向徐州方向去。而我们则穿过敌人的陇海铁路封锁线，走向山东。那时我刚十岁，一路上我都跟着爸爸和大部队步行急行军，弟弟年龄小，只有六七岁，只好随行李坐运输员的独轮车。在江苏地区是平原，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和保密，都是黑夜急行军。到了山东鲁南沂蒙山区后，都走山路，路不平，石头多，我脚痛受不了，又看到部队里已有个别比我大的孩子骑毛驴，于是多次向爸爸提出骑一段毛驴，最终找农民征用一条毛驴，骑了半天。到目的地后，爸爸和其他领导一起开行军总结会，爸爸对此事做了自我批评，指出不该迁就我的要求，征用农民毛驴加重了农民负担，下次决不这样做。我知道之后，非常后悔，以后再没有向爸爸提出过非份要求。

我们家从不集体长时间闲聊。爸爸工作很忙，晚饭后，大家最多聊二十几分钟，但从不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从不说人家的坏话。然后就各人做各人的事。爸爸和妈妈看文件、看书、报，或者起草文件和会议讲话、报刊社论等。爸爸还要看朋友和群众的来信，注明给他收的群众来信他都要亲自看和回复，每天都有10封左右，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情况的好途径。这些信封上的邮票就成了孩子们集邮的最好来源。妈妈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工作，同时还兼课，每天晚上还要备课，很忙。星期天除了工作外，就是接待客人，有谈工作的、有新老朋友，经常留客人在家里吃饭。接待客人时不让孩子们在场。

他们不打牌、不旅游、不走访上级联络感情。虽然爸爸爱好文艺，创作过剧

本以及很多广泛传唱的歌词，但由于业余时间工作忙、来访的人多，平时也很少看电影和文艺演出。爸爸的老战友王韦平（韦平），曾经住在我家隔壁，他们的书房窗对窗，王韦平说很少看到爸爸书房的灯在夜里 12 点以前熄灭。他们这种苦行僧般的工作狂、学习狂行为，不少人不理解，反而说他们是傻。这种生活和现在的一些所谓“高干生活”完全不同，现在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是不可能有的“异类”、“神话”。

艰苦朴素是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财富，当时家中孩子多，有 7 个要上学，祖母、和从未出嫁的大姑妈要供养，要付保姆的工资，来客多，即使因公来客也都是自费在家招待，父母的工资有限，经济很紧张，没有存款。房子、家具都是租用公家的。家里人很少有新衣服，没有皮鞋。家中伙食很普通，也没有零食和水果吃。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都没有，后来妹妹参加了工作，她才用工资买了一台收音机。父母从不公车私用，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找关系利用特权买紧俏商品，也不走后门。他们不吃补品，只订了一小瓶牛奶给爸爸吃。来访的新老朋友和群众也从没有人来送物送钱的，连水果都没见有人送过。相反，在困难时期爸爸还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香烟送给有困难的人。1966 年 8 月 5 日爸爸含冤与世长辞后，省教育厅来人帮办后事，要我妹妹找几件衣服好让爸爸衣着整齐地火化。我妹妹翻箱倒柜找不出一套较好的衣服，更找不到一双新的布鞋。出于无奈，只得找了一套半新的中山装，临时买了一双鞋，让爸爸草草火化。这些都直接教育了子女，使我们能吃苦，甘于清贫，顺利度过了爸爸妈妈遇难后那长期、艰难的日子。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住校，住的都是破旧的大房间，通铺，几十人或上百人同住一间，吃大锅饭。早晚是稀饭咸菜，中饭是糙粳米饭，每周只有一次改善伙食，吃少量肉丝或小鱼。家里不给零花钱，生活很艰苦。在苏州高级中学时，星期日想和好朋友、同班同学黄钟一起玩乒乓球，没有球拍，连最便宜的木板拍都买不起，木板也找不到，只好用砖头代替。苏州农村来的黄钟后来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事业有成。我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住校时，家在大行宫四条巷，学校在察哈尔路，路很远，为节省公交车票费，星期六回家和星期天去学校时都是步行。有一次我因生病发烧回家，也是坚持步行。

1957 年我高中毕业，这一年国家调整经济并大幅度减少大学招生人数，大

学录取率低，政府号召落榜生下农村下基层。爸爸和我谈话，要我做好思想准备，考不取就下农村。《新华日报》知道了，还发了报道。我们家的孩子升学都是自己考，不走后门。省教育厅负责人的子女也不能特殊。爸爸不让我在学校里讲家长是教育厅负责人。在苏州时，以至我的班主任都不知道我父母做什么工作。

五

1966年春节前我探亲回南京，这是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期间，爸爸的老朋友王治平和张慧剑来访，他们在谈话时，张慧剑说：“我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海瑞罢官，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批判。”爸爸听后没有讲话。张慧剑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民主人士，是王治平从小的邻居和同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对我们关怀备至的王治平伯伯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春节后，爸爸带我去上海，先到第一医学院看望了老熟人、党委书记陈同生（陈农菲）。陈同生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电影《东进序曲》中的我军谈判代表就是写的他。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遇难身亡。爸爸又去华东局看望了夏征农夫妇。爸爸回来后，在衡山宾馆遇到在华东局工作的刘和庚，刘和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爸爸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第二天爸爸去看望了顾民元烈士的遗孀朱秀英和她的女儿顾乃粒。顾民元烈士是爸爸的好朋友，顾民元还是江上青烈士的入党介绍人。其父顾怡生先生曾是爸爸的老师，爸爸对顾怡生先生一直非常恭敬。晚上爸爸带我去看望老友李俊民和夫人汪臻子。当时李俊民正在被批判，几乎无人敢去看望他。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整个晚上气氛都非常压抑，有时大家相互无言以对。当时的情况李俊民在文革后写的回忆中有详细叙述。回招待所后，知道老熟人、著名作家吴强曾来看望爸爸，没有遇到。因为时间紧迫，爸爸无法去回访吴强。第二天，我们就回南京了。与表面平静的北京相比，上海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使人感到重大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

回南京后第二天，我就回石家庄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我远在河北石家庄，他们遇难的消息一个多月后才知道。

六

爸爸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对毛泽东很敬佩，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赞赏，曾写了不少文章进行过分析。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指示时，不唯上、不唯书。他说就是圣人仓促之间讲的话也是会有错误的。爸爸对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是有保留的，有不同看法的，对一些做法也有不同的意见，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却无法公开表达。

我在大学时，学校里大跃进后政治运动不断，大搞形式主义，就是不抓正常的业务学习，业务学习效果大受影响，使我的思想非常压抑。爸爸知道后多次对我说：“年轻人一定要开朗。”“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战略性的，不能作战术性理解。比如毛主席说上课可以睡觉，但是大家上课时都睡觉就不对了。”“学习毛主席指示不能搞形式主义。”“小平同志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庸俗化。”“学校应该以学为主。”

南京斯霞老师的事迹发表后，反响较大。但不久北京传来信息，认为斯霞的经验有问题，她提出的对小学生要有“母爱”、要用“童心”去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才能教好小学生，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要批判。因此，报刊发表了批判“母爱”、“童心”的文章。有一天妈妈向爸爸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讨论此事的情况，爸爸听后没有讲话。以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批判斯霞老师和“母爱”、“童心”的话。

很多人认为爸爸是好好先生、谨小慎微。实际上，他对敌斗争不畏艰险，而对朋友、战友和同志却非常关爱。但爸爸对于多年来不断升级的，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个人崇拜等等，感到困惑。在深切思考的同时，只好用谨小慎微来保护自己。也经常劝有关的人注意在政治上保护自己。

普通农村教师蔡抚民为忧国忧民，大跃进后，不断向中央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建议改变农村的政策，包产到户，因而于1963年被捕，判刑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彻底平反。蔡抚民回忆说：

就在1960年那个年代，大跃进的饥荒恶果已经显现出来，尤以农村最为惨烈。这也是我生命历程中，心灵最为痛苦矛盾的时期。课堂上我也讲形势大好，而课余油灯下，却向苏皖两省委疾书形势大糟，但杳无音讯。我多

么想让上级领导了解下情啊！于是想到了我熟悉的允弘的父亲。1961 年年初四去他家说有些材料托允弘转交吴厅长。第二天，我就匆匆赶回徐州准备新学期的开学。年初八，县教育局打电话给乡文教员叫我到县里一趟。初九，县级领导叫我回南京见吴厅长谈教育工作。这次见到他已是第三次了，但增添了几分严肃。坐定后就直奔主题：“你给我的材料我看过了，有这么严重吗？”我无言以对。只是农业的凋敝，农民的凄苦，自己的无助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哭了起来。这也是吴厅长始料不及的。他沉默良久，倒叫我慢慢说，并耐心认真地听了我如泣如诉的“不同声音”，很少插问。最后吴伯伯语气缓和、真诚地开导我如何看形势，坚信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并爱护地嘱我立足本职把书教好就行了。谈话大约一个半小时，不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吴厅长身为高级干部，如此关切着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思想成长，令我终生不忘。人们对过来的事会看得格外真切。我是 1963 年春节后被捕的。离吴厅长的召见，相距整整两年。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只要有一个无名之辈揭发或告密，足可以扭转某个人的一生命运，而吴厅长身居高位，又和我的观点不一，只需给有关方面打个电话，就可易如反掌地立刻把我打入另类。但吴伯伯始终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已永远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厅长出于对后生的关爱和包容，一直把我看成是成长中的认识问题，定格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李文瑞先生回忆说：

1963 年深秋，吴天石到常州，凭吊李兆洛故居时，转道三河口中学访问高晓声。两人似乎没有见面，吴归来时，又对我大谈司马迁答任少卿的一

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老教育家擎着一杯残酒，反反复复地诵念着。看得出，引古喻今的影射里，实指的是高晓声：在错误的时代、获错误的处分，发愤图强，将来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唉！唉！打一巴掌，再喂一块糖，做皇帝的都这样子！”老教育家愤愤不平，自言自语，也似诉向天下。

“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作家，更难！”老教育家仍喃喃自语，微弯的嘴角噙着似乎不愿倾吐的焦虑和哀愁。

在苏南文联时，吴天石和高晓声曾有过部属关系，但不密切。世态大抵扶起不扶落，锦上添花的多。高晓声在阿鼻地狱里，人们如避蛇蝎，吴天石竟毫不避嫌，屈尊造访，并且对人纵谈所感所想，这是老教育家的非凡处。

但是，爸爸对于当时日益升级的和尖锐的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以及其可能对自己的影响，终究还是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早在 1965 年初，国内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爸爸曾经让在家养病的弟弟认真读一遍他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一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弟看了后说除了一点“成名成家”思想外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1966 年“五一六通知”后，紧接着 6 月就在报刊上对爸爸进行了点名批判，那本书立即升级成为了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成了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7 月，江苏省在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了四人，其中有爸爸。爸爸受到的压力可说是极度升高。同时在南京的弟弟妹妹们也受到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压力。一天妹妹与爸爸谈话，说：“爸爸，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要瞒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不能寻短见。”爸爸坚毅、坦率地对妹妹说：“你放心，爸爸、妈妈历史没有问题，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爸爸有缺点，有错误正在检查。爸爸、妈妈不会对不起党，不会对不起你们。”后来，爸爸对弟弟说：

“运动过后，让王治平伯伯送你到三线工厂做工好吗？”可见爸爸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爸爸看似为人谦恭，但内心极刚正。追求真理可以奋不顾身，但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而是认真地自我评判，对于强加给他的无端诬陷、栽赃却绝不会承认。“自有心肠同铁石，岂叫风雪损朱颜”，这是爸爸生前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它充分体现出爸爸的这些性格。

1966年8月3日，那惨痛的一幕时时旋绕在我们兄妹的心头。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死掉了。”现在纪念爸爸真是很难全部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感情。

1986年11月，爸爸遇难二十周年。在江苏省召开的“吴天石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柳林说：“吴天石同志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他在被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时，还痛斥一小撮坏家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片丹心、铮铮铁骨，永为后人楷模。”这也是我们家后代传家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农业中学教师蔡抚民说：“大千世界，半个世纪，多少事付诸东流，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大家纪念他，感激他，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爸爸去世43年后，2009年国庆前夕，由江苏教育报刊社主办、《江苏教育》杂志社、《江苏教育报》、江苏教育新闻网承办的全省评比活动中，爸爸被选为“新中国60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这也是对爸爸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评价。

谨以此文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

2010年3月

【文摘】

将军最后的一声吼

黄 正

正是1971年的那个秋天，黄永胜正在走向自己61周岁生日，共和国即将迎

来第 22 个生日。这两个生日都还没到，却来了个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他以在战争中曾无数次面临生死一线和胜负一瞬所锻炼出来的直觉，意识到自己决无侥幸。

这一天，那个恐怖的 9 月 13 日已过去了将近一周，邱会作带着大儿子邱路光到黄永胜的住处，来看望自己的老搭档、老战友。

到今天，快四十年过去了，邱路光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情景：

黄永胜正坐在办公桌前批示文件。邱路光看过去，只看见坐在窗边的黄伯伯的背影，他的肩膀和手微微颤抖着，一边批着字一边说：“胖子（邱路光小名），你黄伯伯我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啊！”

黄伯伯没有抬头。因为邱路光逆着光，在他眼中，从窗外扑进房里的光线，将黄伯伯搅在一团不明不白的光网中，他只觉得黄伯伯那个背影——孤单无助，苍老悲凉……他的眼一热，就要洒下泪来……

黄永胜让邱路光出去办个事，他要与邱会作说些什么……等邱路光再回到这个房间时，只见黄永胜站在办公室中占据了整面墙的那幅巨大的“三北”防御态势地图前，久久地沉默着，眼睛瞪着地图上不知哪一个点，就那么瞪着……瞪着……邱会作坐在一把椅子上，盯着黄永胜也不说话，就那么盯着……盯着……

在死一样的寂静中，黄永胜突然用出全身力气，扯肝裂肺地吼叫了一声：

“他妈的！跑什么跑？！……”

叫声停下许久，余音还“嗡嗡”地在房间内冲撞、回荡……

这是一声嘶叫，沙哑、粗厉、尖锐、无奈、绝望、凄惨、不解、悲愤、发狂……它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意味，就像是从灵魂的底里爆出来的，将几十载征战杀伐的岁月集中在声带上，再用军人的全部生命力集中在肺叶中，才能有那样一种吼。这一声吼，发自黄永胜整个的一生！

这是一句拷问，拷问着那个被极度尊敬的直接上级，为什么要把自己这一批一心想干好工作的老部下，丢入一个死局？

这是一句质问，质问在党内、军内可以选百个、千个办法，处理面临的一切，为什么要用“跑”这种选择，将这么一大批军队的精华，葬送在内部斗争之中？

这是一句疑问，疑问那个不明不白的夜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过程，导致出这一种结果？

这也是一句自问，自问着他自己作为一名军人，除了履行职责到最后一刻外，他还能做些什么，诉说什么？

……吼完了，黄永胜转过身来，面对着邱会作，相互对视，凝重地直视对方的眼眸……

接着，几乎同时，两位老军人一起嚎啕大哭。哇哇的，嗷嗷的，大张着嘴，涕泪横流，浑身抖动……只哭得房摇地动，天云变色！

哭完了，两人握了握手，什么也不说了，告别……

哭完了，两人眼泪抹干，照样干自己的工作，出席会议，出席外事活动……

他从来就不曾把毛泽东与林彪分开来看过。现在，他心目中的这个整体突然爆开了，还跑掉了一半，他根本就不能相信！

几天后，周恩来一个电话要黄、吴、李、邱四位老军人到大会堂开会。这一去，黄永胜就走上了他的前三任曾走过的那条路……不同的是，前面三任在那条路上可以峰回路转，他和他军委办事组的三位老战友，至今也没有找寻到一个出口……

摘自《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尾章“北京青岛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文摘】

按：本文作者于 1965 年高中毕业，因爷爷在台湾这一“家庭历史问题”而无资格上大学，被分配当中学教员。在北京师院附中实习一年期间文革爆发。她随串联大潮外出，跑遍了几乎大半个中国。新疆是她的最后一站……

大串联中新疆行

刘海鸥

一、去新疆

1967年7月份回到北京，根本不再去学校。一想到学校，就伴以去年不堪回首的记忆，就想到那些令人讨厌的人。

从6月份以后，全国的武斗越演越烈，已经发展为内战，听说重庆的武斗数万人参加，每人都持有步枪手榴弹等，还使用了几百门大炮。还听说武汉为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组织了大规模的横渡长江活动，被对立派潜在水中乱杀乱砍，死伤无数，江水都染红了。

听说新疆那边闹得凶，我心里又活泛起来。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因为那里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前两个月在云贵川虽说有武斗，但是没有真正看到武斗的场面，没有真正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新疆又让我跃跃欲试。二是那里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他们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饶有异族风味，对他们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浪漫。而最重要的是姐姐海燕在那里。家里人没日没夜地为她那没心没肺的拼命三郎般的性格担忧。

和每次出行一样，我去找外地上访人员搞火车票。那时全国各大军区和地方军野战军都已经介入了文化革命，而且是支持保守派的为多，所以造反派都跑到京城来“告状”。上京告状的人多住在北京大专院校第三司令部的大本营地质学院。三司支持造反派不问青红皂白的，凡是造反就支持，凡是打倒“走资派”的就是革命的。

我在地院找到了新疆人的住处，和他们商量去新疆的事情。那些人都是新疆红二司的，属于造反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支持红二司的，而且要去新疆支持他们（其实我根本不了解红二司是什么观点）。他们当然十分感激，票很顺利地就弄到手了。在地院我还认识了一个机械学院的学生大千，也在找路子去新疆，我们一起搞到了票。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男生，忘记叫什么了，高高的，秃顶，有些像老头。

三妹听说我要去新疆，也要去。那时我们已经多时不说话了，因为她在中学生的“四三”派里搞得很热闹，我觉得“四三”派过激，乌合之众也多，常常和她发生争执，两人关系很紧张。这次她主动找到我，我也就替她弄了一张票。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每次串联它都跟随着我。里面有一两件衣服，和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还有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毛主席语录》、扑克牌和地图册。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

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她大吵大闹，她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我不理解爸爸为什么支持我去新疆，后来才知道就是为了姐姐海燕。

二、被炮轰

8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出发了。火车到乌鲁木齐需要开五天四夜。第四天的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兰州。说前面有武装袭击，火车停开了。我们只好下了火车。

兰州也已经变成了壁垒森严的战场。整个城市呈现着好像被“三光”以后的景象。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所学校，好像是一个什么技校。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教室门大敞，里面桌椅翻倒。灯泡玻璃几乎都打碎了，墙上弹迹累累，焦痕斑斑，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我们在二楼找到一间有电灯的教室，把桌椅拼凑了一下，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四个人为打发无聊时光玩起扑克牌，准备就这么打一夜。我们打的是当时最流行的“四十分进贡”，大千和我打对家，我不会打，乱出牌，总是输，向对方“进贡”。大千是那种特别聪明好胜的人，气得他脸都白了，不过我们就是打打而已，不像后来输了要贴纸条，最后发展成压宝赌博。

深夜，我们还在打扑克，只听见外面炮声隆隆，一声接一声，发炮的地方不算太远，闪着红光，炮弹是朝我们这个方向打来的，震得玻璃哗哗响，楼板也在颤动。我跑到窗口张望，炮火是从对面的一个建筑物发射出来的，目标正对我们这一间亮着灯的教室。我们立即明白了，这个学校已被势力强大的一派控制着，他们赶跑了另一派，今晚见学校里又有灯光和动静，一定是以为另一派又跑回来在搞阴谋复辟活动，所以炮火猛击。我们知道绝不可以久留，立即关上灯，猫腰溜出教室溜出学校，又回到火车站。

三、镇定的声音

明天才能想办法去乌市。我们在火车站台转了一圈（经常爬火车，可以毫不费力地就钻进火车站台里），看见一辆挂着开往乌鲁木齐牌子的火车黑灯瞎火地停在那里，就摸了上去，车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睡觉，我们各自找了一个凳子躺下。

不知是几点钟，反正是漆黑的深夜，突然间一阵粗暴的吆喝声把我惊醒：“都是干什么的，不许动，谁动就捅了谁！”睁开眼，明晃晃的手电光在脸上晃动，照得眼睛睁不开。借着忽闪忽闪的手电光见一群粗大的汉子，面目狰狞，头戴钢盔，手端长矛。长矛和电筒一起在眼前比划着。平生头一次经历这种阵势，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我感到巨大的危险包围了我们，浑身不由自主地战抖起来，三妹也吓得哆哆嗦嗦。实际上车厢里的人都吓呆了，除了那群汉子的吆喝声，没有任何声音。持长矛戴帽盔的人继续吆喝，起来起来，都带走。我听说过，被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抓走，是连命也保不住的，难道真是要未曾出师先折戟？

正在上牙磕下牙地打颤，只听见有一个镇定的声音：“大家谁也不要走，谁也不要动。”那些武装汉子的头头被声音牵过去：“你们是干什么的？”那镇定的声音道：“我们是首都三司联络站的记者，我们去新疆调查武斗事件向中央汇报。”汉子问：“你们支持哪一派？”“我们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红二司。”

事情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首的那个头头说我们是甘肃的造反派组织，我们和新疆红二司的观点是一致的，咱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说罢握手言和，下车之前表示要替我们站岗放哨，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不知不觉地，人们都已经循着那个镇定的声音围了过去，似乎找到了主心骨。我和三妹也挤到那个人的身边。

那个人的镇静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跟着他这样的人一起是没错的。第二天弄清了这帮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都是一二年级的。夜间镇定退兵的是他们的老师姓高，是那帮学生的领头。我们和这帮人一同上了去乌市的火车。

火车过了嘉峪关，嘉峪关以后是满目荒凉的景色，没有绿树草地，只有黄土地、黄土山、黄土建造的村落。人说一过嘉峪关，两眼泪涟涟。海燕当时进疆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我记得她在信中谈过的。

四、下车伊始

到乌市已是黄昏时。一大帮人大概一百多一起下了车，其中有科大的十多人，我们四人，还有一些到新疆串联的散兵游勇，更多的是新疆红二司上京告状返回来的人。一下火车全体人马就到自治区革委会静坐示威，提了什么要求，大概是

给红二司平反之类。

新疆的两派是以打倒还是保护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来划分的。当时的形势是新疆的“老保”——“三促会”占着上风。人数多声势大，有军区支持，而且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保王的。

我们一行人坐在自治区委大院的台阶上，久久不见人出来，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大家索性就在院里过夜等待明天早晨。那天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纪念。街上的大喇叭喊得热闹。新疆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8月的新疆夜里极冷。我们坐在大院的台阶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尽量减少散热面积。刚开始大家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一支又一支。最后还是冷得受不了了，遂两人一伍排成长队在大院里跑起圈来。嘴里高喊“打倒王恩茂！”“支持红二司！”一类的口号。就这么折腾了一夜，很是热闹，当时是觉得热血沸腾的。

第二天等军管会的人来上班，有人和他们交涉，大概是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撤离了自治区委大院。

五、市容印象

乌鲁木齐的街道拥挤喧闹，不时地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武装工人，飞驰而过，或者堵塞在某个小街小巷。车上架着机关枪，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他们叫苗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呼喊口号或唱着歌。马路边上，市民照常活动，似乎是两个世界，一部分人忙于打仗斗殴，另一部分人就在他们的身边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乌市商业中心各族人来来往往，商店依然繁忙。街心花园孩子们追打嬉闹，维族老汉懒洋洋地晒太阳。更妙的是在市中心广场，高音大喇叭里播送着美妙的南疆歌曲，我虽然听不懂，但我知道那决不是革命歌曲。那曲调带着古波斯的神秘，一波三折，委婉凄美，让人心痛，让人感伤，让人百听不厌。

六、稀里糊涂

我们和科大的人驻扎新疆大学。新疆大学算是红二司的大本营，也基本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桌子和椅子堆砌在教学楼或宿舍楼楼道的中段，把楼分成两个

部分，那也已经是两派斗争的遗迹，现在学校里只剩下了红二司的人。每天早上学校的高音大喇叭就传出维语广播：“新疆红卫兵英格拉维……”直到几十年后，我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看见被桌椅堵塞的楼道，听见“新疆红卫兵英格拉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印象那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

科大的学生十分听从高老师的指挥，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收集一些情报，刻印小报，散发传单。还经常开会，制定方针，我和三妹也被邀请参加。他们还给我搞了一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新疆记者”的证件。虽然就是薄薄的小纸片，但有三司的大印，非常有权威。可是开会我是插不上嘴的，因为觉得谁说的都对，也怕一开口就露出自己的无知。我常常为自己的“糊涂”而苦恼和自责。现在想起来，除了有一腔革命热血，自己干的什么并不明确，简直是稀里糊涂，那时怎么会想到文革整个就是一场愚民运动呢，糊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唯一的活动是和高老师一起去采访了乌市红二司的造反派头目姜安安。一个女孩子，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当时已经大名鼎鼎，人人提起来都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去了广播电台找她，因为拿着首都三司的记者证，很容易进入。在电台里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姜安安藏身之地。这位名人对首都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和我们谈形势谈任务，当然，都是高老师在谈，我只是对这个威名四扬的造反派女头目好奇才跟着来的。姜安安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长相很一般，可冲劲十足，说话很有魄力，这又让我很自惭形秽。

七、高老师

我只能做一些事务工作，自告奋勇写小报，刻蜡版（我的蜡版字刻得很好，是漂亮的仿宋体），印传单。一天碰到高老师，他与我打招呼，称我老刘。我问他为什么叫我老刘。他说你工作认真，我很敬重你。故称老刘。

高老师是老八路出身，陕西人（那个鼻子实在是陕西人的）。他说他八岁时就和父亲上战场，父亲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小孩子趴在后面观战。

高老师是一个很有魄力和智慧的人，能上科大然后又能留校的人必不简单。当然还必须是党员。他也就二十七八岁，学生们都很听他的，也爱和他开玩笑。他永远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料子叫尼龙华达呢之类，当年的时髦玩意。那种料子刚穿上很笔挺，没多久就泄了，走了形，而且无限地拉长，他那件中山服就长

得盖过了屁股，裤子也踢勒特勒。学生们总拿他的衣服取笑，他自己也嘲弄自己的衣服，一坐下来就撸起裤腿和袖子。他的身材看上去很瘦，可是胳膊腿十分粗壮。他长得很奇怪，脸窄长，眼睛又大又黑又圆，鼻梁高高的，鹰钩鼻，嘴不大。这幅搭配似乎应该构成一个英俊的面孔，可是在他那里组合得很可笑，像一只鸟。我和妹妹私下里称他为“高鸟”。有时坐在一起开会，越看他越像一只鸟，我捅捅妹妹，两个人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最后收不住，谁也不知道我们笑什么。

八、小霞

我通过新疆大学的一个朋友（她原是北京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但是1964年新疆大学到北京招了一批汉族学生学维语做翻译，出身要求不严格，于是她总算上了大学。）找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小霞的地址。

小霞是我的小学同学，上六年级时他们一家被发配到新疆的阿克苏，因为反右时他爸爸作为群众代表向党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受到组织的整肃。到了新疆她爸爸找不到工作，只有她妈妈一个人做体力活养活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小霞很聪明，考上了新疆工学院。

我立刻去工学院找小霞，还真的找到了。多少年没见面了，我们兴奋得大叫。当晚就住在了她那里。小霞是新疆工学院红二司兵团的广播员，她的嗓音清脆悦耳，小学是北京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小歌手，教我唱过《太阳落山了》、《深深的海洋》，去新疆前她还把心爱的《外国名歌二百首》送给我，封面已经翻烂，贴着蒙娜丽莎的画片，我一直保留着。现在即使在播送《敦促保皇派投降书》时，她的声音也照样清脆悦耳。

广播站设在图书馆，小霞也住在那里，床夹在两排书架中间，躺在床上看书左右逢源。她让我睡在她的床上，想要什么书拿走就是。我抽出一本书《红字》看了一夜。我什么书也没拿走，那阵革命第一，带上几本外国小说看是很不合时宜的。

还是那年冬天，我在北京又见到了小霞，她来“上访”，住在我家。小霞的眼睛直楞楞的，说：“孙涛被流弹打死了。”说得很平静，让人心寒。孙涛是小霞的男朋友。在新疆时我见过孙涛，他是工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1966年孙涛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代表西北红卫兵到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回疆后组织了一个战斗兵团，誓死捍卫毛主席。我离开新疆不久，孙涛在一次武斗中被对立派枪杀。让人惊悚的不止是孙涛的死，很快我就发现，小霞已经精神失常。

1980 年小霞的爸爸平反，那时他已经去世多年。小霞迁回内地南方的一个城市。她的病时好时坏。

九、生活在炮轰中

红二司的大本营新疆大学多次被对立派攻打，最终失守。为了安全，我们搬到了外贸局。外贸局地方不大，却为红二司占领。接待我们的人叫小王，文文弱弱的。他的妻子，也是小巧玲珑的。他们都是江苏人。言谈之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对武斗十分厌倦，很想回老家呆一阵，只是因为孩子刚刚出生不便出行。他对我们的要求尽心尽力，替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事情。

外贸局的人早都不上班了，办公室空着，科大的学生住在一个大办公室的外间，我和妹妹住在一个小间。常有炸弹落到外贸局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我们怕遭冷弹，轻易不敢在户外活动。有一天傍晚去食堂打饭，穿过院子，一颗炮弹就落在身边，震耳欲聋。奇怪的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中，从来也没有觉得害怕过。

十、差点被捅死

一天我在街上转，我经常自己上街看情况，不觉走到火车站附近，见一大队人排着队喊着口号。我上前问个究竟，知道他们是刚刚下火车的上京告状返回的红二司派群众，有几百人。这些人在北京时间呆久了，不知新疆“老保”已经绝对地控制了局面，红二司则早已转入“地下”，一下火车就不知死活地开始了示威游行，三五人一伍，拉成长队。一路高喊口号“打倒王恩茂！”“打倒保皇派！”有的人拿着刀子匕首，有的人甚至敞开衣裳，亮出腰里别着的一圈手榴弹。我知道这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一定要出事，就跟在队伍旁边看个究竟。

果然，当队伍进入一条街，街的前端已经被沙袋木架铁丝网等路障封住（就象巴黎的街垒战一样），沙袋上架着好几挺机关枪，沙袋后面卧着操机关枪的人。路障前站了一排人，头戴帽盔，手持长矛，腰间和胸上缠着皮带，气势汹汹地摆

出了准备刺杀的姿势。游行队伍打头的人心有点虚，但还是迎了上去，嘴里仍然呼着口号。那一排横握钢矛的人紧逼过来，迫使队伍站住。

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打头的红二司的人还是不明情势，破口大骂，持钢矛者火了，一帮人冲上前去对准为首的就要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过去，挡在中间，用手抓住一个长矛的尖端，使劲往回一顶，嘴里喊道“不许武斗！”持长矛的人没料到这一手，被顶得往后一个趔趄。霎那间六七根长矛尖同时顶在了我的胸口。队伍中有人把我往后拉了一把，长矛紧紧地逼上。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拿长矛的看我和那些人风格不一样，说话也不同，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说：“我不跟你们说话，叫你们的头头来。”这么一端架子，更没人敢下手了。一个汉人走过来，大概是头头，我掏出自己的“记者证”，两个指头夹着递出去，做出不卑不亢的口吻（实际上心里也虚）：“我是首都红卫兵驻新疆记者，我会把这一切向中央文革汇报。你放我离开这里，否则后果自负。”听我的口气这么大，那个汉人上下把我打量一番，仔细地看看我的证件，略一思考，把手一挥，矛子们离开了我的身旁。他让我从旁边的一条小街出去，我想，走也要走得堂堂皇皇，就面无惧色大摇大摆地向前方，冲着路障和机关枪走去。其实我心里也是胆怯的，他们若在后面捅我一长矛，或在前面一扣扳机，我就完了，但是我知道此时我决不能表示怯弱。

整个队伍安静地注视着我走出街垒。一离开那条街，我简直要撒腿逃跑，还是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远。那条街前后左右都被封锁，游行队伍全班人马都成了瓮中之鳖。押到哪里，怎么处置我就知道了。后来听说为首的几个被杀，其他的被迫投诚。

这是我在新疆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现在想来，很愚蠢。那时有一条“林副主席”的语录十分流行：“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让我想起了两个词，老毛称赞的“痞子”，还有我们家乡话“光蛋”，这话安在他们身上最合适。）多少个年轻的生命为了实践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在文化革命中高颂着这条语录投身于狂暴混战，死得毫无价值。

十一、新歌联战

在新疆红二司的旗下有一个极有名的造反组织叫“新歌联战”，我觉得这个

名字很特殊，也好听。他们的战旗上“新歌联战”几个字也书写得漂亮，有形有体。他们的全称是“新疆歌舞团联合战斗队”。

临去新疆时，爸爸让我们去探望他的一个朋友，带一封信给他。那人也是被贬谪入疆的。他的住地正是“新歌联战”的大本营，在一个绿色葱茏的大院子里，房子的建筑都很有特色，像是苏联电影里看到的集体农庄的房子（好像是文联或作协宿舍）。我们没有找到爸爸介绍的人。他的邻居自我介绍叫都幸福（多么具有讽刺性的名字），也是一个不得志的文化人，告诉我们，那人已经回老家了。我和都幸福及另一个邻居刘坚聊了一会，他们说运动之初“新歌联战”十分活跃，也很有影响力。其中都是艺术家、作家。现在“新歌联战”已经不吃香了，这些人在崛起的工人阶级面前很难抬头，多数都当了逍遥派。他们介绍说这里有从内地因右派或犯错误发配来的著名的作家音乐家画家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很想见见这些人，又不知他们都躲在哪里。都幸福问，这么乱，你们到新疆来干什么，我们说，来找我姐姐。他问姐姐在哪，叫什么。当他听说姐姐是刘海燕，说，刘海燕我认识。你和她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海燕的朋友遍天下。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已经无从考究。（我上网搜了一下，都幸福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理事，专业作家。）

十二、找到海燕

我天天盘算着怎么去伊犁。海燕在伊犁的兵团农四师，她是自愿去的，可是从去的那天起，就不能忍受兵团生活和纪律，得罪了层层领导。文革正是一个机会，她被兵团的造反派整得很厉害，被管制，失去了自由。全家人为她日夜操心，寄希望于我把她带回家

一天新疆大学的朋友到外贸局来，带着一个不速之客——海燕。一见到我海燕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又惊又喜，告诉她这是假的，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我知道爸爸给她发过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这么老实的爸爸都给逼到这个份上了。

收到爸电报，她不管不顾溜出了兵团，顺便偷了仓库一袋菜籽，在伊宁卖掉做盘缠。这更惹怒了兵团，扬言抓住她就要把她打死。正是晚间，我带她到外贸局吃饭。那天正好伙食大改善，传说天山那边的羊因为大雪无处生存，牧民把羊赶下山来，两块钱一只大甩卖。外贸局买了一些便宜的羊，熬了一大锅羊肉面汤，

每人油汪汪的一大碗，里面好几大块羊肉，每块都有半个拳头那么大。我吃了一两块，再也吃不下了，肉太肥，厚厚的一层膘。海燕忙说，你不吃给我。她把我的和她自己的肥羊肉都吃了，吃得满嘴流油，香得不得了。不知道她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

不敢让海燕在新疆久留，当下我就帮她弄了一张火车票，送她回了北京。看她离开了这个鬼地方，真为她庆幸，不知道后来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她。

十三、去专县

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因为没收到我的信，爸爸非常不安。信中千呼万唤“赶快回来吧！”又千叮万嘱“千万不要去新疆外县串联，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信中最后说：“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我真是太年轻，根本没把爸爸的话放在心上。继续留在新疆，策划着去外县串联。

红二司派的人都躲起来了，在乌市的工作没法展开，我决定下专区县。倒不是想去发动群众，而是我一直对“下边”极有兴趣，只有了解了下边的生活，才能对中国以及对生活有真正的了解。我打算顺着乌伊公路调查沿线的区县，最终目标是伊宁。本来为的是看海燕，也是被伊犁那个边陲小城所吸引，海燕曾在信中做过那么多描述，她是那么喜爱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下去的时候，海燕已经回京，但我仍然不打算改变路线。

三妹和一个科大学生已经离开，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听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道路被封锁过不去，甚至被殴打，又回到乌市，然后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回了北京。

外贸局的人帮我们联系了卡车。第一站是沙窝，住在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里，这里充满了恐慌的气氛。红二司派的人神色紧张地把我们关在屋子里，急促小声地向我们述说老保的势力有多猖狂，如何制造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们的人被捉去后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夜间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年轻女人家，是新房，刷得雪白，被褥崭新。她的丈夫是运输司机，跑长途去了，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这女人小巧玲珑，是四川的农村人，年龄比我还小，还带着新娘子的鲜艳。她似乎对文革一无所知，只是一个劲地怜悯地望着我说，“好可怜呀。”我躺在大炕上，想的是另一回事。我想，

一对小夫妻住在这样一间暖和干净的小屋里，是多么惬意的事，当丈夫跑长途归来，小别如新婚，这小屋该充满多么浪漫的气息。我突然对这么无尽无休的漂泊产生厌倦，我想回北京了。

十四、革命应该是强者

第二天早上见到高老师，他说这里的造反派太紧张胆小了，昨天夜里把他带到一个地洞里，大家蹲在那里（高的陕西口音说“东在那里”）大气不敢喘，就这样窝了半宿，深更半夜时又说有情况，摸黑偷偷转移到另一个什么地方，一晚简直没有睡觉。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吓唬自己，就像讲鬼故事，越讲越害怕。

我和高老师一起在镇上转转，一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批评此地的造反派。他说，要革命首先就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如果只看到对方的力量强大，自己先胆怯了，那么自己就已经首先把自己打败了。革命者必须是强者。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有道理有气魄，心里暗暗佩服了他几分。联想兰州火车站的夜晚，他确实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小供销社，在里面看到了新疆生产的奶油花生糖，大颗大颗的，有近二寸长，便要买来尝尝。高老师一定要掏钱买，推了半天推不过去，只好依了他。心中十分警惕，怕吃他的多了嘴软。

十五、假领子

下一站是到农一师，就是周恩来曾经参观过的地方，我们在厂部奎屯落脚，此处离周总理去的石河子不远。造反派在向高老师介绍情况时，我被许多上海女知青围住，问长问短。这些女青年都是高中毕业后由于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而来支边的，在此已经呆了好几年了。算来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她们见了大城市来的人热情之极，对我简直是羡慕和崇拜的样子。她们把我拉到宿舍里，屋子虽狭小，却十分干净整齐，墙上贴着一些小资味道又不过分的小装饰画，床头有饼干盒子，或玻璃瓶子装着各种上海小零食。上海人爱吃零食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女青年的毛衣都是旧毛线结成，但是袖口领口是新毛线，罩上外衣，露出领口袖口，看上去穿的是一件新毛衣。毛衣的领口翻出花色雅致的衬衣领子，其实他们穿的

是用带子连接在腋下的假领子。

上海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丢不掉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时我看不惯，心想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还这么虚荣，为谁呀。一两年后，北京也开始风行假领子（上海总是引领中国时装新潮流，北京总是比上海慢上一两年）。那时我已经忘记不屑上海人的感觉，和众多女孩子一样，选择最心爱的花布，自己缝制假领子。我倒不是出于“衣服”常换常新的虚荣心，而是对美的追求。那时我绝对没有勇气穿一件和假领子花色相同的衣服上街，但是露出一条花领子，敢。可怜我们的爱美之心只敢表露在一牙领子上。再想想那些上海女知青她们又何尝不是出于爱美之心呢？生活在边陲，劳动在大田，前景迷茫，还想尽办法展示自己的美丽，让人又凄凉又感动。

十六、农家院女孩

离开农一师时，造反派还送给我们一个大镜框，里面是毛主席标准像。我们只有恭恭敬敬捧过来，随身带上。我心里觉得抬着这么大一个镜框到处走很不方便。怎么阶级感情越来越少了？

再一天我们到达乌苏，这里也是一派失败主义情绪。造反派躲躲藏藏，老保耀武扬威。看来王恩茂在新疆的统治是很得人心的，尤其是少数民族都站在保王的立场上。按照红二司的话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少数民族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到达乌苏已是夜晚。我们被带到一个小院子里，院里有一间房子，房子旁边还有后建的一个小屋。院子里有个架子，攀援着瓜类的植物，成了一个自然的凉棚。主人是一对母女，家中的男人常年在外面工作。我们谈了几句，他们就把高老师领到什么地方睡觉去了。我住在女孩的屋里，就是正房边上的小屋。想不到这近于农村的地方女孩还有一个与父母住房分开的小屋子，房子十分狭小（如北京地震后四合院中普遍盖起来的“临建”）。放了一张单人床，床架很高，旁边一张书桌。我最喜爱这种小而全的屋子，有一张舒服的床躺在上面看书到深夜，有多么舒服。

女孩床头的墙上，竟然还有一个自制的简陋的书架，里面摆了一些不俗的书。想不到这个农村的女孩还有这般爱好。我浏览女孩的书籍，发现一个本子，翻开

看看，是女孩的日记。完全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女孩的生活和思想，我偷偷地阅读了她的日记。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她的日记与我当时充满革命口号和思想总结批判改造的日记截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文革时代的人写的，日记中不断地诉说一个少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朦朦胧胧，非常的小资情调。其中多次提到生活的无趣，生命的无意义，流露着厌世的思想。从日记中看，没有指向具体的事件，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我很惊异于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一个青春女孩竟发出这样的呻吟。她的“真”使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一个人，我对自己有些隐隐地不安。

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女孩。十六七岁，面貌十二分地娟秀端庄，身材修长，皮肤细白。她很有礼貌，但是淡淡的，冷冷的，眉宇间有一丝忧郁。她既没有都市女孩的娇和傲，又没有农家姑娘的俗和朴，气质很特殊。我们很快离开了，没有时间多接触这个女孩，但她的形象及日记中所涉心声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么多年从不泯灭。

十七、在沙湾等车

到了乌苏以后，前面的路再也过不去了。公路各关口被老保把持，二司的司机谁也不敢冒险闯关，再说到伊犁要办边境证，十分不易。我们决定回头，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再单独跟高老师行走了，一路上我总觉得接待我们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在这些偏远闭塞的地方，人们对这样两个游方的孤男寡女更会浮想联翩。

回去时只有去沙湾的车，我们在沙湾运输站一个工人家落脚，等待回乌市的过路车。工人姓索，似乎认识所有过往车辆的司机。他有个女儿十四五岁，叫索新芳，新芳这个名字极为大众化，但加上一个不俗的姓“索”，就令名字很不俗了，由此我也就记住了她的名字，三十多年，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忘了，就是难忘她的。

索家做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车，老索说，当天的车都过完了，只有等第二天。我非常不情愿，一旦决定回去，就立刻觉得归心似箭。老索不想让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露面，把我和高老师安排到一个地窝子里，里面只有一张占了半间房子的大炕。我和高关在一起心里很别扭，我知道他一直有意追

求我，但我毫无意思。我躲他远远的，他坐在炕的一头，我坐在另一头，也不和他说话。倒是索新芳一直陪着我玩和说话，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憨憨地没有心机，她也要跟我们上乌鲁木齐她姑妈家。我回京后还给她写过信，寄过东西。

十八、司机和毛主席像

第二天我和索新芳一起在路口等着她爸爸截车，买了一毛钱一杯的瓜子，两人嗑着。终于截到了一辆去乌市的车子，可是车子只能带两个人，高老师让我们俩先走。我和小索高兴地上了车，坐在驾驶舱里。小索挨着司机，我靠窗坐。不久小索要和我换位子。换了座位，我才发现司机在打轮时，右臂有意无意在加大幅度，胳膊正好碰到我的胸口，我也不好意思出声。有办法了，那不是有一个毛主席像框吗，我把它抱在胸前，你要碰就去碰毛主席吧。

到了乌市下车，我们向司机道了谢，除了大幅度打轮，司机对我们基本上是好的。临走司机吭吭哧哧了一阵，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把那个装毛主席像的大镜框送给他。我正愁这玩意儿拿不好拿，放没地放呢，乐得顺水人情送给了他，他笑得简直开了花，一个劲地感谢。我心中也有些不解，我差点要把他归到流氓坏人那一类了，他怎么对领袖毛主席还是那么热爱呢？！

十九、陌路者的哀怨

回到乌市，外贸局的房子已空，科大的人全走光了。我一天也不想多呆，当下就收拾了东西，“办”了一张火车票（以红卫兵记者站的名义在火车站直接搞的票。一两个月后，账单寄到师院附中的革委会，我老老实实付了车票钱68元，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当天就坐火车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不久他就和我聊起天来。其实只是他聊，满肚子的牢骚，听口气像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干部。他讲生产如何遭到破坏，国家财产如何被人据为己有，人心如何江河日下，社会治安如何混乱，人们生活如何艰难……他一口气谈了几个小时，并非侃侃而谈，而是声音低沉的诉说，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焦虑及对现实的迷惘。我没想到在这样的大时代还有人发出这样的哀鸣，心里不完全赞同，但还是安静地听着，因为他是那么忧虑和悲伤，他所说的那些话肯定不敢和他的同事朋友说，只能对一个陌路者发泄一下，

而且对象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我听着，渐渐困了，一觉醒来，那人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深夜在哪一站下了车。但他的沉痛忧伤说话口气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二十、法国革命者

回到北京，科大赴疆的战友们常聚会。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做了新疆羊肉抓饭，包羊肉饺子。虽然做不出地道的新疆味道，但还是吃得热热闹闹。我们还和他们从新疆带回来的女孩子一起游览北京各个风景区。

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香山游玩，在鬼见愁上大家合影。上来一个高个洋人，身穿中山装。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们说：“我是法国人。到中国来学习革命。”他很想和我们这些“红卫兵”照一张相片，我们欣然同意。其实只有一个人带着新疆红二司造反兵团的袖章。

照完后我就忘记了此事。几年后我竟从另外一个途径得到了这张照片。

海燕有一个同学华，妈妈是法国人，华在中国长大，常到我家玩，文革后回了法国。在法国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看相册，见到了我们在鬼见愁上的那张照片。她很惊奇地发现我也在照片上，说：“这不是海鸥吗，我认识她。”于是那个法国青年就请她把照片转交给我。几年以后，华回中国，这张照片终于到了我的手里。

世界上总有这么样的巧事。

摘自作者在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上以“海鸥南飞”网名发的长帖《文革大串联》中第五章“武斗升级”。小节略有删节调整，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资料】

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1968 年 3 月 23 日成立)

董国强 整理

主任委员：杨广立

第一副主任委员：滕俊清

副主任委员：彭勃，林逸（暂缺革命干部 1~2 名）

常委：

杨广立，滕俊清，彭 勃，林 逸，赵志德，李来水，高黎光，房 震，
徐莲娇，陈云龙，胡 勇，李 玉，张德生，庄恩有，钱鸿森，吴坤效，
徐 浩，彭正山（暂缺 7 名）

委员：

（解放军代表）

杨广立，滕俊清，彭 勃，林 逸，赵志德，李来水，李昌炎，李春德，
高如珍，王广坤，徐富芝，马志平，毛 钊

（革命干部代表）

高黎光，房 震，徐莲娇，陈云龙，司传宝，徐 彬，王 鑫，刘济川，
聂英杰，贺志道，徐想起，张宗仁（暂缺 7 名）

（群众代表）

钱金海，鲁学智，陈德富，陈宝林，丁长顺，宋成洪，马培德，施金福，
严韵笙，王化勤，苏学俭，苏 干，毛守根，许 欣，周仁勇，吴鹤林，
曹顺山，毛恒义，李仁全，陈志娟，秦春保，王桂珍，陈宪德，曹松涛，
罗富有，纪锦堂，王宏昌，刘振蓉，毛大勇，马大如，方世裘，王少华，
陶冶全，王兴恩，沈立志，喻从俭，汤大民，耿昌贤，周文昌

（全部委员计九十五人）

原载 1968 年 3 月 28 日江苏省《革命工人报》。董国强提供并简注如下。

杨广立：六十军政委，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滕俊清：六十军副政委

彭 勃：六十军一七九师政委

林 逸：盐城军分区第二政委

赵志德：南京军分区司令员

李来水：南京军分区参谋长

高黎光：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房 震：南京市财办主任

徐莲娇：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陈云龙：南京市计委主任

胡 勇：南京机床厂工人（好派）

李 玉：南京浦口区农村大队干部，劳模，派性观点不详

张德生：南京电磁厂工人（促联）

庄恩有：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学生（好派）

钱鸿森：南京电子管厂技术员，新工总（好派）

吴坤效：南京市市政建设公司，一般干部，转业军人，南京八二七（屁派）

徐 浩：南京市建邺区医院医生，老工总（屁派）

彭正山：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学生（屁派）

李昌炎：南京军分区副参谋长

李春德：部队干部，其余情况不详

高如珍：六十军干部，其余情况不详

王广坤：部队干部，其余情况不详

徐富芝：部队干部，其余情况不详

马志平：部队干部，其余情况不详

毛 钊：南京军区，参谋

司传宝：南京市财政局局长

徐 彬：南京市二工交副部长

王 鑫：南京市城建局副局长

刘济川：南京市农工部副部长

聂英杰：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贺志道：南京市交通局负责人

徐想起：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宗仁：南京市中级法院负责人

钱金海：南京 511 厂工人，新工总（好派）

鲁学智：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办秘书，新工总（好派）

陈德富：南京工艺雕刻厂工人，老工总（屁派）

陈宝林：南京 511 厂工人，新工总（好派）
丁长顺：南化公司工人，新工总（好派）
宋成洪：南京无线电厂工人，新工总（好派）
马培德：江南光学仪器厂老工人，屁派
施金福：南京第二机床厂工人，屁派
严韵笙：南京化纤厂工人，南京八二七（屁派）
王化勤：南京晨光机器厂车间支部书记，东方红（屁派）
苏学俭：船舶辅机厂技术员，东方红（屁派），
苏 干：工人，好派，其他情况不详
毛守根：南京 5311 厂工人，南京八二七（屁派）
许 欣：南京工艺美术厂工人（“好派”转“促联”）
周仁勇：情况不详
吴鹤林：南京 511 厂工人，老工总（屁派）
曹顺山：南京汽车运输处车队驾驶员，老工总（屁派）
毛恒义：南京铁路局工人，老工总（屁派）
李仁全：南京市纺织品公司，一般工作人员，八二七（屁派）
陈志娟：南京市商业局宣传科长，老工总（屁派），
秦春保：情况不详
王桂珍：情况不详
陈宪德：南京水泥厂工人，老工总（屁派）
曹松涛：南京百货公司工作人员，新工总（好派）
罗富有：情况不详
纪锦堂：南京市教育局一般干部，八二七（屁派）
王宏昌：机关干部，好派，其他情况不详
刘振蓉：情况不详
毛大勇：南京无线电学校学生（屁派）
马大如：南京机械制造学校学生（屁派）
方世裘：南京地质学校学生（好派）
王少华：南京三中学生（好派）

陶冶全：南京市十三中学生（促联）

王兴恩：情况不详

沈立志：南师附中学生，“南京八二七”中学总部负责人（屁派）

喻从俭：南工学生，南工“东方红”勤务组成员（屁派）

汤大民：南师青年教师，南师“八三”勤务组成员（“促联”后转“屁派”）

耿昌贤：南大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勤务组成员，江苏红总勤务组成员（好派）

周文昌：南大实验员，南大八二七勤务组成员，南京八二七勤务组成员（屁派）

注：江苏省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因对 1967 年 1 月 26 日夺权持“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不同观点而分裂为“好派”和“屁派”。“好派”主要是“江苏红总”、“新工总”等，“屁派”主要是“老工总”、“东方红”、“八二七”等。在 1967 年春夏之交，南京又出现了以促进“好派”、“屁派”大联合为号召的第三派“促联”。“促联”的规模很小，在两大派中政治立场游移。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一度积极支持“红总”（好派）反许世友。许世友得到中央支持后，“促联”又长期沦为“屁派”附庸。

部分军队代表职务经余汝信先生校订，谨致谢忱。

【编读往来】

[1、胡泊：问责 Vs 责问](#)

看到“编读往来”因钟青谷先生而起的相关文字，也想参与讨论。

“在他们的文章中还多次提到《记忆》，话里话外指责你们为老兵，为血统论，为当局说话。可你们对这些批评，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反应。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这很违反常理呀！”——钟信慨乎斯言，令人想到时下很热的一个词：问责。掌握一切公权，公共事件发生后却吝于吐露半字的官员，实在需要问责。然而加诸学术研究乃至民间网刊如《记忆》，未免有文不对题之感。

莫非学术就不能“问责”？那也未必。美国读者钟青谷及其列举的“旅德学者王

容芬、旅西（班牙）人士黄河清和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无一例外身居海外或港澳。同在境外的，还有一位以打假而闻名的方舟子。方的打假渐有扩大化之嫌，宗教、中医、环保尽入彀中，故仅取其最负盛名的学术（学历及论文等）打假。以唐骏、肖传国事件为例，在方舟子举证后，唐、肖或“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反应”；或干脆动用“武器的批判”，雇凶打人。可想而知，那是因为无计可施及恼羞成怒，更是因为问到了点子，责到了痛处。钟先生的“问责”（准确的说法是责问），用在这两位公众人物身上，也许更合适。

问责是责问的一种，不过前者的标准远高于后者。对于言及要害，事关真假的问责，《记忆》应该积极回应才对。至于动辄“左右”，满口是非的责问，我想不止《记忆》，人生苦短，任何想做点事情的人都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去一一澄清、声辩。这分明是在顺应常理，并非“违反常理”之举，对吧？

[2、范世涛谈史料](#)

第 62 期《记忆》“故纸堆”栏目刊载的曹荻秋《我的检查（摘录）》重要而罕见。对于这类史料，我建议尽量完整地提供给大家，尽量不用或少用“限于篇幅”规则加以“摘录”。因为重要史料的价值，其实常常高于正文，牺牲一点篇幅，也是值得的。

[3、黄斌华来信](#)

看到上海文革专辑，十分亲切。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你们是在实实在在地建立“文革博物馆”。把所谓的“一月革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感谢你们的辛勤努力！中华民族将永远记得你们的贡献！